



人”。机器人工业的发展，正在进一步威胁工人的就业机会。日本是机器人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汽车工会总工会已声称将对使用机器人实行“对抗”路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今后二十年内由于机械手的使用，将有230万美国人失去自己的职业。英国官方也发出警告：包括机械手在内的电子控制系统的广泛使用，将使英国的就业人数到1990年减少为1,900万人，到2000年将减少到1,700万人。

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普遍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是一成不变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增长是直线发展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但同时指出：“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sup>①</sup>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消费增长与贫困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

## 第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两种形式：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的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马克思当时认为：“劳动者越是生产更多的财富，他的生产在威力和范围上越是增长，则他反而越来越贫困”。马克思在这本手稿中提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绝对的贫困”和“相对的贫困”。他引许尔茨《生产底运动》一书中的话：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所得都增大了，这当然不是事实，然而就算它是真实的，但各种所得的差异和**相对的**悬殊越来越大，其结果则是贫富的对立越来越显得尖锐。因为**正因为**总生产上升了并且在同一程度中需要、嗜好、要求也会增加，从而**绝对的**贫困会减少反而**相对的**贫困会增加。”<sup>①</sup>

1847年，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也曾从绝对的和相对两种意义上说明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增长；同一时期，马克思在《工资》一文中，谈到“在发展过程中，工资双重地下降：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财富的发展来说。第二，绝对地，因为工人所换得的商品量愈来愈减少。”<sup>②</sup>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sup>③</sup>又说，“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就越来越深。”<sup>④</sup>“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sup>⑤</sup>

①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2、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4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6、707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1、715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用过“绝对贫困”<sup>①</sup>和“绝对的贫困”、“相对的贫困”的术语，没有用过“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术语。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是从“绝对的”和“相对的”两个方面来考察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和贫困增长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绝对贫困化”一词，说明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和贫困的绝对增长；用“相对贫困化”一词，说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和贫困的相对增长。1912年，列宁写《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一文，以当时的德国为例，说明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存在相对贫困化的情况。列宁说：工资的增加赶不上消费资料价格的上涨，“食品、衣服、燃料和房子都涨价了。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但是，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较**份额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sup>②</sup>

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认为，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两个表现方面。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陷入极其贫穷的贫困状态，以及贫困的绝对增长，即越来越穷。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资产阶级比较处于贫困的地位，以及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无产阶级所得的份额越来越小，而资产阶级所得的份额越来越大，即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对增长。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无产阶级的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40页。

②《列宁全集》第18卷第430—431页。



对贫困状况和贫困的绝对增长的情况是变化着的，因而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而相对贫困化则是经常存在的，是绝对的。

### 第三，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

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无产阶级陷于极其贫穷的状况而言，这种贫困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的状态，这是普遍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势必有所改善，极其贫穷的绝对贫困状况成为某些特定时期的和局部的现象。而且，由于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上的必要消费资料量是一个变数，在一定生产发展阶段上的生活贫困现象也是有变化的，因此也是相对的。就贫困的增长而言，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不是直线发展的，不表现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越来越贫困；而贫困的绝对增长是一种间歇地在某个特定时期出现的现象。

#### 1. 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

资本主义在欧洲从十六世纪开始，此后大约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发展，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期。这一时期，特别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绝对地恶化，并沦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由于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急速提高以及劳动的简单化使女工和童工被大量使用，大量工人遭受排挤，同时大量的破产农民流向城市，这一切造成了城市的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同时，由于当时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力量还没有发展起来，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资本家就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极力压低工资，给予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但是，当代的工人“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sup>①</sup>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库钦斯基提供的实际工资的历史材料表明，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实际工资基本上是连续不断地下降的；从三十年代开始，英国的实际工资略有上升，但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仍达不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sup>②</sup>可见，马克思当时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绝对贫困化现象间歇地不断发生。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六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但这个时期工人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了局部的改善。恩格斯说，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sup>③</sup>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际工资开始有所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也有所缩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三十年间，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时期，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增强，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sup>②</sup>参阅林振淦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第271页。



他在四十年代写的“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sup>①</sup>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那种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越来越贫困”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越来越增长’。这样绝对地说是错误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sup>②</sup>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改变，工人阶级的贫困并没有消除。而且，在此期间，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几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阶段上的无产阶级贫困的绝对增长的基本原因之一。1885年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每每被“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所以，虽然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时也有改善，“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所排挤，……这种改善每次都化为乌有。”<sup>③</sup>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二十世纪初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又转向恶化。1900—1904年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以后，各国的实际工资又开始跌落。紧接着又发生1907—19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列宁指出：“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sup>④</sup>特别是资本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第2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页。

④《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4页。



义世界爆发了1929—1932年的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生产一落千丈，失业大量增加，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十分严重。

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的战争，也是造成一定时期的无产阶级贫困的绝对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生活费用空前上涨，实际工资跟着下跌。按库钦斯基提供的材料，英国的实际工资1917年降为1914年7月的76%；在德国的大城市里一般工人的实际工资1918年降为1914年的7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贫困大大增长。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受战争的创伤，经济困难，实际工资低落。在西欧，资本家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使这些国家的实际工资迟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至于战争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给千百万人造成难以言状的痛苦，更是罄竹难书了。

3. 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发展趋向。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这在战后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战后初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相当显著的改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以制造业为例，1970年和1979年比较，美国增长48.8%，日本增长289.7%，联邦德国增长242.4%，法国增长120.4%，英国增长46.1%。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建立起一套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有些私人企业也举办福利措施。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社会福利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0年的8.9%增加到1976年的20%以上。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



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1年分别达到5.7%、18.4%、13.7%和20.6%。居民的消费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食品开支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开支迅速增加。住房条件和医疗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劳动时间由战前的每周平均47小时缩短到40小时左右，旅游业也得到迅速的广泛的发展。这些都说明，战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从表面上看确实基本上已不存在，至少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在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由于生产的迅速扩大，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有可能得到提高。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内容和数量也发生变化；维持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包括为获得一定劳动技能所需要的教育和培养费用，也在增加。战后社会保险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因而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所支付的公共教育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其实质不过是工资的转化形态。因此，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身所要求的。同时，战后以来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力量进一步壮大，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获得显著的成果。面对着工人阶级更加强大的组织和斗争力量，资产阶级为维持其生产和对社会的统治，不得不改变其统治和剥削的方法。他们大力在经济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剥削相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手段，并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等福利主义一套来刺激生产，缓和阶级矛盾。





其次，战后在一定时期内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虽然基本上已不存在，或者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但它还是局部地存在着。这突出地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依然存在。这种状况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划定所谓“贫困线”，即一种很低的家庭收入的标准。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是资产阶级政府公认的贫民，也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应该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金实际上是很菲薄的。美国的退休金一般只抵原工资的20—30%，日本私营企业职工养老金1977年只是月平均工资的25.3%，因此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方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失业工人都能领到失业救济金。美国平时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一般占失业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在最近一次即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中，政府又大量削减福利开支，在1982年9月份的1,130万失业工人中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工人有660万以上，即占60%。在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则比较高些。

最后，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泥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又出现了绝对恶化的趋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袭击下，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趋于绝对下降。例如，1973—1975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中等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直到1978年他们的实际收入还没有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1979年美国开始新经济危机的头五个月，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资折合年率下降了5.5%；1980年美国实际工资比上一年下降了4.8%，1981年又比上一年减少1.3%，1982年7月比上年同期减少0.6%。近年来经济情况较好的日本，1980年领薪职工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比



上年增长5.7%，大大低于当年8%的物价上涨率；1981年靠薪金生活的家庭的实际纯收入继续减少。另一方面，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经济滞胀和危机的加剧，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面临严重的局面。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美欧各国政府着手猛烈缩减福利预算。七十年代以来，在技术进步和生产停滞的双重压力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再加上实际工资的冻结和下降，社会福利开支的缩减，势必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贫困阶层扩大，对工人阶级加重了贫困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在六十年代，美国官方认定的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从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这个贫民人数又趋于增加，即从1973年的2,340万人增至1975年的2,590万人，增加了10.7%；1978年这种贫民人数2,450万人，占美国全国人口的11.4%，1980年达到2,930万人，占整个人口的13%；1982年增加到3,05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6%。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增加。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陷入绝境。向教堂领取施舍食品的人群排队成龙。在一些国家的大城市里，流浪者踉跄街头，挨冻受饿。自杀率上升，酗酒、吸毒、精神病患者和社会犯罪现象增加。由此可见，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了；它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仍然发生，有时还很严重。不过它是有条件的存在，因而具有相对的性质。

#### **第四，相对贫困化是绝对的**

相对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战后，它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和经常的现象，并且具有持续发展的趋势。不论就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而言，还是就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程度的增长而言，都具有无条件的，即绝对的性质。这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说明。



1. 工人的收入和消费低于整个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水平。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时期，人们的社会消费水平是不同的。但在一定时期中，有一定的社会消费水平。整个社会消费水平一般讲是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一般讲也是在增长的，但与资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与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比较起来，差距不断在扩大，特别是和资产阶级相比更为显著和突出。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程度依然在增强。美国迈克尔·帕伦蒂在他所著的《少数人的民主》一书（1977年再版）中指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千分之二的超级富豪，拥有美国公司财富的60%左右；约占美国人口总数1.6%的美国大资本家占有美国股票的80%，他们拥有州和市公债的全部以及公司债券的88.5%。据最新统计，1983年美国拥有资产100万美元以上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约有63.8万人；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富翁人数在1920年为33人，到1983年已增加到5,500人。许多大垄断财团的财富在惊人地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所属的54家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产为12,470亿美元，同1974年美国十大财团的12,505亿美元的资产几乎相等。这54家大银行、大公司在1982年所得利润523亿多美元，占美国当年全部利润1,175亿美元的74%。在1982年8月12日至1983年7月1日期间，美国53个垄断资本家在华尔街股票涨风市场搞投机交易，每人获得暴利一亿美元以上。其中休利特·帕卡德公司（该公司在美国最大300家公司名列第81位）的创办人之一戴维·帕卡德，他一人竟获暴利12亿美元。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的情况是这样。那末，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情况怎样呢？美国



政府规定，1982年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9,862美元者被列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这种穷人，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73年为2,300万人，到1982年就增为3,440万人，即十年内增加49.6%。这些穷人，在所谓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连最简单的食物、衣着和住房都得不到保障。据美国全国市长会议估计，美国现在有200万人无家可归，过着乞丐和流浪汉的生活。在最繁华的纽约市，至少有36,000个流浪汉。<sup>①</sup>关于美国贫民的惨苦情况，资产阶级报纸有时也有所透露。请看美国《华盛顿邮报》1983年12月25日的评论吧。它说：“目前，全国有千千万万人在施汤站、食品救济处和乳酪赠送站门前排队。从临床角度讲，这些人倒不是快要饿死了，但他们确实是饿。政府的统计数字无法表明那种饿的程度，但是许多方面的人士——牧师、市长、参议员和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亲眼目睹这种现象存在，却是无可辩驳的。问题仍然是，在这样富裕的国家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了吃一顿少得可怜的免费餐而宁愿站在寒风中等着，领取食品的长龙怎么会越来越长呢？一个原因是，需要食品救济的人增加得快得多。贫困状态和失业率都急剧增加。此外，政府免费食品券开支虽然增加，但有很大一部分被失业津贴和福利救济金的减少所抵消。因此，尽管食品援助增加，许多人却更穷了。如果你同执行食品施舍计划的人谈一谈，他们就会告诉你，要求施舍的人向他们提出的最普遍理由是食品券用光了（快到月底时排队的长龙增长）。由于越来越多的穷人目前非常穷——在半数以上的州，凡是收入达到贫困线50%以上的家庭，目前都得不到救济——因此，许多人在食品券用完后就买不起食品，这是不足为奇的。还有

<sup>①</sup>参阅徐炳和：《在美国，人人有发财的机会和自由吗？》，1983年12月1日《光明日报》。



些穷人根本就拿不到食品券。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工业国家——英国、联邦德国、日本、瑞典、丹麦等等——只有真正的乞丐才偶尔到慈善施汤站去。这些国家都有很多失业工人。但是只有在美国，他们必须带着孩子排队等待勉强吃饱一顿”。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类似。例如在法国，占人口10%的最贫困者与占人口10%的富裕者在财产上的差距，1949年为15.7倍，1975年超过28倍。1975年法国全国每户平均财产约为20万法郎，工人每户平均财产仅6.69万法郎，而工业家和大商人的平均财产则接近100万法郎，即1与15之比；租房居住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5%）与工业家和大商人（几乎全是房主）之间财产比例，高达1比70。

2. 工人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工人的工资相对地下降。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规律**，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是工作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占有。因此，想通过材料证明工人的生活状况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某个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驳这个规律，这是荒唐的。”<sup>①</sup>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可以得到提高的，但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为资本家利润的更大程度的提高所限制。在工人新创造的社会财富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而相对工资即和资本家利润相比较的工资份额不断地趋于下降，所以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在不断积累。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在他们所创造的迅速增长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部分第8卷第1分册，国际版（新版）第226页。转引自《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2期。



的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这种状况十分明显。剩余价值率是劳动者受资本剥削程度的准确标志，战后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继续趋于提高。①美国从1848年到1977年的三十年间，劳动生产者实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9.7%下降到26.3%，下降了11.5%；资产阶级所得剩余价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从70.3%提高到73.7%，提高了4.8%；剩余价值率从236.7%提高到280.9%，工人阶级被剥削程度或相对贫困化程度提高了18.7%。②据统计，日本企业的剩余价值率，1960年高达420.7%，1970年增加到430.5%，大大高于战前1930年的182%和1935年的303%。实际情况表明：“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③

战后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当然，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并不是直线地逐年上升的。在某一个年份可能比上年降低；从国别来看，战后许多国家的剥削率呈上升趋势，但有一些国家在战后一段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

①我们这样来计算剩余价值率：从资产阶级统计的国民收入中剔除资产阶级收入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在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时从工资的统计中扣减赋税负担并加上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津贴。

②参阅姚廷纲《战后美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程度进一步提高》，《世界经济》1980年第11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389页。



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sup>①</sup> 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是绝对的那样的规律，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只能是这样。

## 第二章 按照各国实际，建设 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必然趋势，也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实践更不是一刀切的。各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需要通过实践来解决，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列宁指出：“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sup>②</sup> 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与那种由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形态不同，它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没有干过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制度所经历的时间还不长，同其他社会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81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400页。



制度的历史相比，社会主义还是幼年至多是少年时期，它本身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各国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实践和探索，因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将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当然，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称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决不是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批判的那些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在当代也是相当流行的，我们必须严格地同它们区别开来。

下面，我们就举几个重要的例子来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样化及其特点问题。

### （一）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首先进行了伟大的实践和可贵的探索。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没有别国的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条件的限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可能是完善的，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苏联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作为世界上最先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世界劳动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创立了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同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它决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产生。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对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剥夺。然而，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向劳动人民交出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他们必然要进行殊死反抗。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sup>①</sup>十月武装起义之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措施。它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健全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特别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常备军，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为剥夺资产阶级，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提供了可能。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域最广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第一次上升到统治地位。这就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激发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sup>②</sup>马克思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暴力革命的辉煌胜利。十月革命作为暴力革命，它的特点是首先在城市取得胜利，然后再扩展到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十月革命的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端，然后革命继续向全国范围扩展，各地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纷纷起来与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逐步夺取各地的政权，最后取得全国的胜利。这是一条由城市到农村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一个封建性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采取了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就要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指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礎。”<sup>①</sup>苏联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通过下列两种途径实现的：

1. 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剥夺，究竟是否采取赎买的方式，这要看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sup>②</sup>。十月革命后，根据当时的情况，苏维埃政权对资本家企业采取了无偿剥夺的办法。

起初，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这是苏维埃政权在工业方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页。



面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措施之一。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4日制订了工人监督条例。为了保证这个条例的实施,在各省和工业区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工人监督机关的决议,工厂主必须执行。根据工人监督条例的规定,在拥有工人和职员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转在一万卢布以上的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商业部门、农业企业和合作企业中,一律由工人监督其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加工、分配和购销,以及企业产品与原材料的保管和财务活动等。工人监督的实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有些资本家竟公开以怠工、停业、关闭厂房、封闭矿井等手段威胁工人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工人监督条例的实施,积累了管理工厂企业的经验,为实现整个工业的国有化准备了管理干部,而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监督,也加快了工业企业国有化的进程。1917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国有化的第一个法令,使一些私人企业变成了国家的财产。1918年年初,颁布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铁路管理条例》,把铁路管理权交给铁路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商船国有化的法令。一些地方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也陆续实现了国有化。在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同时,也逐步对私人银行以及对外贸易机构实行了国有化。

通过苏维埃政府上述一系列重要经济法令,在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等方面实现了国有化,一方面使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所有制的建立,在分配方面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积极劳动,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总之，在如何建立全民所有制的问题上，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了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

## 2. 逐步改造小农经济，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农民个体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小私有经济。它不能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动力，无力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它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和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随着全民所有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农业中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小农经济不能剥夺，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他们。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决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sup>①</sup>

苏联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制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光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不仅获得了原属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和教会的1.5亿俄亩的土地，而且到1918年夏秋时，剥夺了富农5,000万公顷的土地，从而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还在1918年2月19日，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土地社会化》的法令中就规定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就劳动和产品经济意义方面比个体经济更为有利的一种经济，以便过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渡到社会主义经济。”<sup>①</sup>有些地方的农民在分地过程中，就着手组织集体农庄。但农业集体化主要还是在1930—1934年全盘集体化时期完成的。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国家。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苏联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以及存在其他主、客观原因，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曾犯过错误，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曾经“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原则。”<sup>②</sup>对这些缺点，在集体化过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断地加以纠正和解决。

在两种公有制形式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苏联都把全民所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认为当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占有形式时，必须采取“过渡”办法，把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 **第三，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偏重于重工业发展的经济结构**

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被提到首要地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③</sup>。通过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如何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对

<sup>①</sup>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sup>②</sup>《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7页，第249页，第251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率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二十年代末以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给予苏联经济结构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苏联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包围之中。在“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sup>①</sup>的情况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必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为尔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成绩应当是肯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和探索不一定是完全成功的。

从理论上讲，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优先发展轻工业，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sup>②</sup>把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是划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道路的标志，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首先，虽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都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如德国就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期的普遍规律，在经济落后的小国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顾国情一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不一定要重新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和方针不能说是普遍真理。

从苏联的实践看，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曾导致如下严重的后果：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6页。

<sup>②</sup>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6页。



(1) 妨碍了农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sup>①</sup> 苏联也不能例外。但是，长期以来，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建筑在损害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一方面，苏联通过高征购、低价格等办法从农业和农民手中拿走的太多，远远超过了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积累，以致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每遇荒年，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保不住。另一方面，重工业部门并没有面向农业，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与此相反，苏联却规定不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和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基本生产资料，而只能购买和拥有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之类的小农具，企图用这种办法和凭借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去控制集体农庄。在实行有利于重工业发展而不利农业发展的政策的情况下，苏联农业发展极其缓慢。据统计，1913——1953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6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39.1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6%，直到1953年，苏联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1913年的水平。

(2)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轻工业的严重落后。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sup>②</sup> 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再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它是为发展消费资料生产服务的。但长期以来，苏联在实践上却与此相反，把重工业视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配力量，而把轻工业视为只是为消费服务的消极因素。重工业部门没有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装备，而主要是为本部门“自我服务”。即使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1页。



重工业建立了相当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后，苏联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因而，苏联的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增长速度缓慢，产品的花色品种少，质量次。据统计，1953年同1913年相比，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甲类工业总产值增长39.1倍，而属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工业总产值仅增长7.16倍。

(3)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sup>①</sup>列宁也说过：“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sup>②</sup>然而，苏联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恰恰是忽视了人们的消费，为生产而生产，除了造成农业和轻工业落后以及市场紧张外，由于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还要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因而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28—1934年，苏联在粮食、肉类、植物油、布匹、糖等方面实行了配给制，这种配给制恰好是在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情况下实行的。关于这一点，莫洛托夫在1934年承认：“为什么在六年以前我们实行配给制呢？这是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我国高速度工业化政策的实现，虽然当时我国的农业极落后，我们还是要保证党所采取的工业化速度。”<sup>③</sup>

由此可以看出，五十年代以前，苏联在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观点指导下，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忽视人民消费的不合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

<sup>②</sup>《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

<sup>③</sup>莫洛托夫：《关于取消粮食配给制》（在联共（布）1934年11月25日中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34年俄文版，第6页。





理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第四，在经济管理体制的实践方面，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这是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面前一项极其重要而困难的任务。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sup>①</sup>

五十年代以前，苏联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三十年代苏联国家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这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代表，不仅掌握全国主要经济命脉，而且成为经济管理的主体。国家不仅规定国民经济的基本发展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而且决定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的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这就是：企业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资由国家调拨；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以及生产多少，由国家计划规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包销，价格由国家规定；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工资等级和标准以及每个企业的工资基金都由国家规定。在基本建设方面，建设项目由国家决定，建设资金由国家拨给，建成后无偿地交给经营单位使用。在这种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的权限很小，只能照章办事，无从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管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忽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

<sup>①</sup>《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经济。国家计划的实施，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来保证，这就势必造成一个庞大而重叠的行政管理机构，往往由于脱离实际而导致不少决策上的失误。

3. 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活动，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结果是，企业在生产上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就不能通过市场灵敏地反映出来，造成生产和需要的脱节，既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

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苏联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要争取时间在短期内迅速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旧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开始起步的，面临的困难条件多，而建设的任务又极其繁重。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有助于统一调动原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国家最迫切需要的重点项目。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苏联经济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就开始表现得很突出了。

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之所以产生，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在颇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机械地搬用了。马克思曾设想过，在新的制度下，整个社会生产可以象一个大工厂那样由一个中心来集中指挥，由一个中心来分配一切资金、劳动力和物质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设想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以及市场关系将被消除。当时苏联在探索计划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实事求是地从自己的国情特点出发，建立了一个忽视市场



机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并不是偶然的。

## （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独一无二的。在战后，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些国家一般都照抄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也曾经是这样。1948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主义情报局，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它也感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照搬是不行的。于是南斯拉夫努力探索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它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特点呢？

###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采取以社会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形式**

南斯拉夫在全国解放以后，通过1946年和1948年两次颁布的国有化法令，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改变为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除手工业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在工业中占居主要地位。南斯拉夫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由国家集中统一地支配和使用有限的生产资料，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必要的。南斯拉夫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最初级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认为国家所有制仍然存在着矛盾，即生产者仍然与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获得对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权。他们认为，这一矛盾会带来消极的后果；直接生产者实际上仍然是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容易产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官僚主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者的文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必要也有可



能由直接生产者支配和管理生产资料，把生产资料国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1950年6月，南斯拉夫决定把工厂企业直接交给劳动者自己管理，开始实行工人自治，使劳动者直接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此以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被改变为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成为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任何集团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所有从事劳动的人，并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管理。南斯拉夫认为，社会所有制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相比，是公有制的较高级形式，而最高级的形式则是共产主义所有制。

在公有制的形式问题上，南斯拉夫进行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探索，是和他们对社会主义时期国家职能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南斯拉夫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阶段也是适用的；国家的职能应当逐渐消亡，国家职能消亡的起点就是国家经济职能的消亡。基于这样的认识，南斯拉夫变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南斯拉夫在以社会所有制为主导的同时，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私人所有制成分。1980年，在全国国民收入构成中，公有制所占比重为85.2%，私营成分为14.8%。1963年宪法规定，允许公民用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开设手工业小作坊、小商店或小规模的服务业，原则上禁止雇工，必须利用他人的辅助劳动时，最多只能雇工五人。1974年宪法根据联合劳动原则作了新的规定：这些个体经营单位一般应成立联合劳动组织，以免出现雇工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方面，



除了社会所有制的农业联合企业和农场外，还存在大量的个体农户。1980年，属社会所有制的农业单位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7%，个体农户耕地面积占83%。社会所有制农业组织，本着自愿和物质利益原则，通过综合农业合作社和农工联合企业等形式同个体农户进行合作，使个体农户的生产在不同程度上纳入社会生产计划，这是南斯拉夫改造小农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 第二，实行企业自治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

在1950年以前，南斯拉夫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和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相似。这种管理体制在南斯拉夫解放初期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经济管理体制毕竟不利于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国家机关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方法的管理，确实容易产生官僚主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50年，南斯拉夫决定改变这种依靠国家行政管理经济的体制，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普遍建立工人委员会，把企业交给工人自己管理，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目前南斯拉夫实行的管理体制，是以企业自治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

南斯拉夫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除了前面已提到关于国家职能逐步消亡和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以外，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按照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应加强计划的协调作用。在上述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南斯拉夫经济管理体制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特点：

1. 改变指令性计划为自治社会计划，国家只下达指导性计划。



南斯拉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是商品生产者，企业的产品只有通过市场出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认为把计划管理权全部集中在中央机关，用行政的方法管理经济会产生不少的弊端。随着自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南斯拉夫于1952年把集中计划制度改变为社会计划制度，1971年后又实行自治社会计划。自治计划由各级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制定，而社会计划则由区、共和国和联邦政权机关制定。各级社会计划都不具有指令性，只起指导作用。计划分为短期计划（年度计划）、中期计划（一般为五年）和长期计划（一般为十年以上）。在计划制度中，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起协调的作用。自治协议是企业 and 事业单位相互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社会契约是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达成的基本准则和原则的文件。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中，确定发展目标和各自的利益，确定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确定供产销的关系。在编制计划时，既强调经济主体即企业的独立自主权，又强调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南斯拉夫的计划制度看来，联邦政府编制的社会计划虽然起重要的作用，但它不具有指令性，只有指导性，为企业、行业、地区在编制计划时提供参考，而企业则根据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并逐级进行协调。因而，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实际上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2. 实行企业自治，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较大的权限。

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后，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相比，南斯拉夫企业所拥有的权限是最大的。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的企业的权限主要有：

（1）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本身的利益，独立地自行制定生产计划。企业可自行决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自行组织产



品销售，并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独立确定产品的价格水平，企业有权决定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任务。

(2) 改变过去实行的统一调拨物资制度，企业可在市场上自由购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3) 有自主的劳动管理权。企业有权招收和解雇职工。

(4) 有独立的财务管理权。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对纯收入的分配有完全的自主权，企业可以自行确定积累与个人收入的比例。

### 第三，实行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分配的原则

由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既是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基本要素和具体体现，又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劳动者既然是生产的管理者，也应当是企业收入的分配者。

南斯拉夫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来确定自己的收入分配原则。这就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总产品首先要作若干必要的扣除，然后才是用作个人消费的部分。这些扣除的大部分，不是由国家掌握，而是由社会所有制的各级联合劳动组织和劳动者掌握。国家不再提取扩大再生产基金，也不直接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国家通过流通税和其他税收形式向企业提取一小部分扣除，以用于行政管理费用、国防费用、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费用、促进外贸的补贴，对老战士、残废军人和退休军人的补贴以及储备基金。而用作个人消费的部分则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给劳动者个人。

根据《联合劳动法》规定，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创造收入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位。基层组织按照社会主义自治的原则，由直接生产者共同使用和管理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进行劳



动，共同决定有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问题的解决。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后，属于个人收入的分配必须以个人的劳动成果和对实现收入所作的贡献为依据，而不是按实际消耗的劳动。衡量每个劳动者劳动成果和贡献的方法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所确定的记分制，同时每个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水平取决于本劳动组织的劳动成果。国家不再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制度，而由劳动集体自行决定个人收入标准和分配方法。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开创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南斯拉夫在结合本国的实际，探索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经济管理体制过于分散，分权过多，忽视全国必要的集中统一，以致造成一些消极的后果。同时，社会计划的调节作用表现不够，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借用外债过多，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某些困难。南斯拉夫同志自己已经指出了这些缺点和问题，并且正在进一步改革，力求加以解决。

### （三）卓有成效的匈牙利经济改革

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基本上都照搬苏联模式。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突出地反映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不满。匈牙利人民在党和卡达尔领导下，坚定和灵活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主要特点是：





##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形成在公有制占优势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

匈牙利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它在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中指出，匈牙利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同时发展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匈牙利坚持全民所有制为国家所有制形式，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全民所有制的作用，中小企业保持集体所有制形式更为合适，在共产主义所有制实现以前应当保持这两种所有制的形式。目前又出现了两种所有制形式在某些方面互相渗透的情况，两者通过专业化进行联合的形式正在发展，因而他们认为不能把两种所有制形式加以割裂和绝对化。

在发展两种公有制形式并由它们占优势的情况下，除了支持和鼓励作为社会主义农业有机组成部分的自留地经济和辅助经济外，还允许少量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近年来，匈牙利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过去规定私人小企业雇工不得超过五人，现在规定不超过三十人，同时在保险、退休和休养等福利待遇方面规定私人企业职工与国营企业职工享受相同的权利。现在私营小工商业者（即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店经营者、摊贩），加上他们的雇工和家属，共达15万人。他们经营的范围很广，行业达一百多种。他们在汽车修理行业中占了这个行业总产值的25—30%，在建筑和住房维修中占80%。布达佩斯居民消费的蔬菜和水果有45%是由小商贩供应的。此外，政府还把亏损的国家饭店、食品店和小企业出租给私人，允许雇工；私商向出租单位交纳租金，其余收入归自己安排，但企业的所有权仍属国有。据专家估计，匈牙利大约有300—400万的工资收入者和100—150万的养老金领取者从事各种辅助经济活



动，二者合计将近全国人口的一半和户数的四分之三。辅助经济活动所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社会劳动投入的18—20%。<sup>①</sup>这对于增加社会财富显然是一支大的力量。

## 第二，建立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

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匈牙利也曾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当时匈牙利认为，钢铁工业不发达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根本问题，提出要把匈牙利建成一个“钢铁与机器之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950—1954年，基本建设投资的44.2%用于工业，农业投资只占13.8%；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占92.3%，轻工业只占7.7%。结果，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同战前1938年相比，1956年工业生产提高了2倍，农业仅增长2%；粮食不能自给，30%靠进口。1951—1953年，物价因商品短缺上涨了60%，实际工资下降14%，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是酿成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6年事件后，匈牙利总结了前一段的教训，提出：没有必要机械地模仿苏联的经验，经济政策的正确和经济结构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的关键因素。它从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来安排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这样，匈牙利成为南斯拉夫之后摒弃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概念的国家。为了调整农、轻、重的不合理结构，在投资分配方面增加了农业的投资，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从五十年代前期的13.8%增加到1965年的19.5%，以后一直保持这个比重，直到农业得到根本好转，1971年以后农业投资的比重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适当降低了工业投资的比重，1960年下降到41.3%，1965年降到39.1%，

<sup>①</sup>安·塔博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小企业》，《新匈牙利季刊》1982年夏季号。



1978年又降到36.9%。在工业内部，则降低了重工业的投资比重，相应提高了轻工业投资比重。1978年轻工业已占全部工业投资的25.4%。

匈牙利的经济结构经过调整之后，比例失调的现象基本克服，经济结构较为合理。首先，扭转了农业落后的局面。粮食自给有余，变进口为出口，七十年代每年出口几十万吨到100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和肉类产量居经互会欧洲国家的首位，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其次，在工业内部甲（生产资料的生产）、乙（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得比较合理和协调，两大部类的发展速度大致相等，在许多年份乙类工业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于甲类工业。最后，随着经济结构朝着有利于人民消费方向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尤为迅速，现在已略高于职工的收入。

### 第三，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1968年匈牙利实行经济改革，逐步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它的基本特点是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集中管理同运用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匈牙利领导人认为，匈牙利经济是建立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不能把计划经济同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等同起来；认为对所有企业和所有产品都采取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办法，会限制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妨碍经济的发展。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国家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各项经济活动，因而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两者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有机的统一体。基于上



述认识，匈牙利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取消了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作法，由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只规定经济发展方向和各部门经济的主要比例。国民经济计划只对政府和经济管理机关具有约束力，并不下达给企业；国家主要是通过加强经济调节手段，配合直接的行政干预来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贯彻。和这种计划制度相适应，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和其他收入直接取决于本企业经营的成果和职工本人的劳动，国家只规定工资增长的最低幅度（下限）和最高幅度（上限），具体的工资水平则由企业自己决定，年终分红和奖金也由企业自行规定；企业可利用自有资金和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企业有权增减职工人数，可以自由招工，并有权解雇工人；以贸易制度代替中央统一调拨生产资料和统一供应产品的制度，企业可以到市场上采购原材料，生产企业与需要产品的企业可以相互建立直接交易和协作关系。在价格方面，在保持国家直接规定产品价格的权力的条件下，力求建立比较灵活的价格制度。目前实行三种价格：（1）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和基本消费品，由国家规定固定价格。生产资料产品中约有10%、消费资料中约有20%属于这种价格范围。（2）对于部分原料和大部分消费品以及建筑材料等，实行受国家限制的协议价格。这种价格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最高价格，另一类是规定上下浮动范围的浮动价格。这种价格在生产资料中约占30%，在消费资料中约占50%。（3）对机械产品、半成品和部分消费品，则实行自由价格，由企业自行定价。这种价格在生产资料中约占60%，在消费资料中约占30%。

匈牙利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从1957年起，取消了对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作



法，让它们自主制定生产计划并销售产品。与此同时，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加以调节，以便实现国家的计划。此外，匈牙利在建立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如农业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建立加强管理个体农民和自留地经济的组织形式（农业社自留地经济委员会和生产专业化小组）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地方。

匈牙利在对外贸易方面，直接同国际市场挂钩，极大地发展了进出口贸易。尽管也走了些弯路，并付出了代价，但是成功还是主要的。

匈牙利经过了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工农业生产大大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大为改善，被誉为东欧经济改革出色的标兵。近年来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严重危机的影响，匈牙利经济遭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正在努力加以克服和解决。

#### （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49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那种认为今天中国还不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是十分荒谬的。今后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我国的经验看来，如同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①</sup>

### **第一，我国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我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把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

官僚买办资本在解放前占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本总额的80%，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维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政治上极端反动。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后，就必须对官僚资本实行无偿的没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就消灭其买办性和封建性而言，还属于民主革命性质，这就是在建国初期，在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没收这种资本的根据。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sup>①</sup> 在我国条件下，对民族资产阶级就是采取赎买政策。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区别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地方。同时，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因此完全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的。我国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第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通过对农民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途径建立起来的。

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引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然而，这是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对于他

<sup>①</sup>《列宁选集》第3卷第548页。



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同时，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既有对待农民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又有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经验。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变工队、互助组的经验。

我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就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创造了三种过渡形式：第一步，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这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让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和过渡形式，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到来的，不仅避免在一段时间内农作物的减产，而且还做到了增产。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缺点和偏差（特别是1958年过早地实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由于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农村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除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外，一定范围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和建立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特别是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因为自己经验少，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运用这种模式没有很好结合我国的国情。过去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病是权力过于集中和吃“大锅饭”，结果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束缚住了，造成经济生活一定程度的僵化，使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弹性。实践证明，先进的公有制，还必须与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使经济充满活力，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在“一大二公”的思想影响下，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公越好，社队的规模越大越好，生产



过程只能实行集中劳动和集体统一分配，甚至在人民公社化初期，试图取消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但长期的实践证明，在农业中实行这样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这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长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探索和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从不联产到联产，从联产到组到联产到劳、到户，从包产到包干的发展过程。现在，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已经普及全国。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实行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它在产品分配上更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使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更加落实。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新的管理形式，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它既可以克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弊病，又区别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使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在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下，以保证粮食增产为前提，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发展专业户和重点户，大搞科学种田，科学办农、林、牧、副、渔，并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农户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应用科学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农业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和农村打破吃“大锅饭”后出现的新面貌，给人们以巨大的启示：工业、商业以及其他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可以实行经济责任制呢？各地的试验和实践证明是可以的，并且收到高得多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我国在工商业方面已经搞了一些多种形式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试验。这种



经济责任制是以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劳动成果和职工福利相联系的经济责任制。这种经济责任制适用于各行各业，既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也适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目的，是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它是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吃“大锅饭”问题的有效途径。经济责任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企业的责任首先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满足社会需要，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创造的经济收益，首先要为国家作贡献，使国家增收；其次才是企业多留、职工多得；保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推动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一般朝着实行职务工资和以劳动的多少好坏为转移的浮动工资的方向变动，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还推动了税收、物价和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从而有助于改变企业不管经营好坏一律吃“大锅饭”的不合理状况。可以预料，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广泛而深入的开展，经济责任制将在全国各行各业中普遍建立起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打破吃“大锅饭”制度、建立经济责任制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话，那末，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是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运用，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主要体现。但是，在较长时期里，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忽



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计划统得太多、太死，以致不能生产适销对路、丰富多彩的产品，人民所需日用品数量不足，尤其是花色品种十分单调。实际上，社会需要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社会产品种类繁多，千差万别，要把它们统统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中，又能调节得很好，这是办不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生作用。通过实践的探索和总结，在经济管理体制中确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特点的。具体说来，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即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为了使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方面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上述两类计划的实施，也包括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完全实行市场调节。

### **第三，探索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社会生产的



经济效果来看,是比较差的。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增加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取得的,因而带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性质。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一倍。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较高的;但也说明,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还不相适应。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就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根据建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积累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积累的经验,我们党和国家制订出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十条方针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贯彻这十条方针,就可以使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 1. 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

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逐步下降了,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这种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80%,农业是轻纺工业原料的主要提供者,农副产品是我国市场商品的主要来源,农村是我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又是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同时,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目前占我国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总之,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重大。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在某些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采取的有些政策和措施不利于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不够和没有充分生效、农业技术改造没有当作一项重要任务真正抓紧，农业科研和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农业的迅速发展。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走出一条投资较少，经济效益较高的路子，今后除了逐步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外，仍然主要靠政策和靠科学。近几年来，我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农村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多年来创造的物质技术条件得到更好的利用，农业生产得到又一次解放。今后必须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合作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不变，坚持自留地、自留山和家庭副业生产不变，努力改进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要使农业生产搞得更好，收益大，就要采取适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从自然界索取我们所需要的更多农产品。

2. 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造成轻、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落后，市场上主要轻工产品供应紧张，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发展消费品工业放到重要地位。为此，能源和物资的供应，贷款和投资的分配，科学技术力量的分配和科研课题的选定，以及国外



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都应该注意保证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越是协调，交换和周转越快，社会生产的发展就会更迅速。在我国条件下，加快发展消费品工业，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将促进重工业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对重工业的发展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一些重工业过多地为新建项目服务的偏向。今后，重工业的发展，除了适当生产一些耐用消费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更好地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

3. 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

能源、交通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的解决。

解决能源问题的方针，是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能源的节约要通过调整轻重工业结构以及改进经营管理和实行技术改造的途径达到。与此同时，还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逐步用烧煤来代替燃油，把省出的石油用于国内加工或出口。能源的开发和生产，要兼顾当前的需要和长远发展的需要。煤炭要搞好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加快新矿井特别是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中小型矿井的建设。在电力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要加强新油田的开发，还要搞好地质勘探，增加后备储量。要积极利用沼气、太阳能和风能。能源和交通的建设要结合起来进行，交通建设还应该先走一步。

4. 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



作用。

过去，我国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样做比新建企业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资金不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统统要求最新技术，片面追求自动化。进行技术改造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降低生产成本；改革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综合利用的水平。

#### 5. 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

为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有必要对现有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企业的全面整顿，包括健全领导班子，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以及整顿财政纪律等。企业的整顿工作，是同企业的调整和改组结合起来的。特别是对那些产品产量供过于求而质量很差、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很高、长期亏损、污染严重的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坚决地实行关、停、并、转，使国家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用于那些产品质量好、消耗低、经济效益高的企业。

#### 6. 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

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财政困难，资金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采取正确的政策，调动全体职工，所有企业和各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增加生





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真正的生财之道。

#### 7.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多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最主要的途径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争取外汇，同时利用国际有利条件，适当扩大进口，促进国内工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要逐步改进外贸体制，改善外贸经营管理，做到扭亏为盈。

#### 8. 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谈到。今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有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予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力；要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作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要尽可能做到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

#### 9. 扩大智力投资，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活动。

目前我国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很落后，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很不合理。如果不改变这种状



况，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培养大量的各类各级专门人才和大批熟练的劳动者，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教育方面，一方面是按照教育基本方针办好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和大专院校，以及业余大学等，进行人材的培养，另一方面是努力把职工和农民的业余教育办好。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导和靠山。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方向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能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同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10. 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我国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基本建设中，又片面强调扩大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忽视消费品工业的建设，忽视住宅和城市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其结果，经济效益很差，人民生活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纠正这种偏向，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尽了极大的努力。今后，国家继续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这一基本原则。

现在我国正在根据上述方针，全力以赴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将密切结合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完善和发展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1997年我国将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台湾回归祖国后，那里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将长期不变。这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让两种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并存，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和平竞赛。这对于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现在我们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迎接这一新课题的重大战略部署。

### 第三章 第三世界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 （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是毛泽东同志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邓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是我们团结第三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146页。



世界国家参与推动世界反霸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重要指导原则,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第三世界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情况,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经常在这里受到正义的谴责。拉丁美洲国家发动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原料生产国争取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的斗争,不结盟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斗争,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形成了当代强大的正义潮流,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sup>①</sup>

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尽管已经存在着崭新和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尽管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配和控制着的极不公正、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受它们控制和剥削的主要对象。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起着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至今仍然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也是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第三世界团结奋斗,争取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从当前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和世界战略的高度出发来考虑,第三世界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它的总方针应该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原则又是什么呢?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8页。



我们认为，整个第三世界总的战略任务是加强和巩固第三世界内部的团结，争取和联合全世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为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坚持不懈地斗争。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任务，第三世界各国必须坚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自强，并和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二和第一世界的人民在内）团结合作的方针。只有实行这个方针，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上述方针任务，参考各类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应该遵循下述几项主要的原则：

**首先，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各自的发展战略**

第三世界各国地理、资源、历史、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缺点。各国在制定和实施各自的发展战略时，必须从自己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尽力避免自己的短处。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应该参考，但决不能脱离本国的实际，照搬别国的模式。

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要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和水平的规律，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既要有长期目标，又要有短期目标。不少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的经验说明，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有步骤地进行必要的土地改革，限制和没收一些控制民族经济命脉的外国垄断资本等），同时又不能操之过急（如过分强调国有化，限制私人民族资本，过早地合作化，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等），以致损害



甚至破坏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在推行这种不切实际的急躁冒进的错误方针方面，苏联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肆鼓吹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曾经并还在起着严重的消极作用。

## **第二，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和稳步地争取外援**

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便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改善人民生活。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力求摆脱一切外来的羁绊和控制，根据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地考虑和处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问题。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资金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困难。解决这个问题，要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所谓依靠自己力量，就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也就是说，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人力发展经济。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积累资金，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这里我们特别要讲一下充分发挥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和积极性的问题。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般拥有国营经济、私人民族资本经济和个体小生产经济。在依靠自己力量的问题上，重视和办好国营经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保护和发展私人民族资本经济和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小经济。它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经济的强大支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才能巩固和加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物质基础。

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合作，形成集体自力更生的强大力量。石油输出国对一部分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亚、非、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这些都对第三世界国家集体自力更生作出了贡献。

当然，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意味着闭关自



守，拒绝外援。相反，第三世界国家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和合作，适当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自力更生的力量。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和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这对每个立足于现代的国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应作的贡献。但同时必须承认，当前存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操纵的旧秩序，存在着国际垄断资本和霸权主义对世界劳动人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压迫、控制和剥削。作为还支配着当代国际交换的“指导”思想——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或“比较利益”说），有它的很大的片面性。它掩盖了当前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等价交换的不公正的实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适当利用外资，一方面无疑地要对国际垄断资本缴纳一定的“贡税”（正象列宁恰当地称呼它的），即无偿地转让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和严格的管理，我们就能够节约社会劳动，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对此应当积极地大胆地进行。

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利用外资要采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方针、切合本国实际需要，并与自己的偿还能力和国内配套相适应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利用外资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同时也要防止那种不计本国国力，不分轻重缓急，不计利弊得失，盲目大量借用外资的倾向。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已经有过严重的教训。为了鼓



励外资入境，对于国家急需的经济部门引进外资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如减免征所得税、利润税等）。对外资企业必须加强管理，防止妨害国计民生。吸收外资要多元化，防止上当受骗和国民经济被少数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所控制。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结合本国的现有技术水平和实际需要，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应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同时适当引进一些先进尖端技术，为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创造条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要以引进关键部件和专利为主，尽可能少引进成套设备；一般地说，应避免引进本国已经能够制造的设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要本着学习和创新的精神，不满足于仿制和照搬；要着重结合本国需要，从事革新和创造。要提倡第三世界国家相互间的技术交流合作。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部门，往往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盛行，要认真学习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科学方法，提高效率，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增加经济效益。这对于发展第三世界的民族经济，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根据本国实际，适当安排发展农业、工业、矿业、交通运输、服务行业的比例和次序**

一般地讲，第三世界国家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它为城市提供粮食和原料。工商业的发展一般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一般地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发展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村副业在内，应该合理地注意生态平衡，把粮





食、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按照本国的特点，全面地抓起来，不可偏废。当然，不论哪一个国家，都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把粮食生产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由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这已成为当前世界性的大问题，理应引起第三世界各国的充分注意。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问题不解决，任何正确的发展战略都难以实现。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工业化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要使民族经济现代化，必须以工业为主导。按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发展工业首先要着重发展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它既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加速资金的积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就能为发展重工业创造良好条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从长远和全局看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在实施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按照已经具备的条件逐步进行。“非资本主义道路”论者，把先进国家的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过多地发展重工业，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危害非浅。

#### **第四，注重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

鉴于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单一经济”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要求发展工业或替代进口工业，以及片面强调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等等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要从长远和全局着眼，注重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我们的发展战略要能使人口的增长、人民的实际所得、社会就业、卫生健康、文化教育、增强国防，同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同步地增长，以保证生产和消费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循环。



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增长过快，造成每人平均收入很低，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供应困难，文化教育保健措施远远跟不上。因此这些国家应该把推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过速增长，作为自己的重要战略任务。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积极开发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决定因素，一是技术，二是人的质量。而归根到底是掌握技术的人，是人的文化科学水平问题。这里的基础是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因此必须充分注意“智力投资”。近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人员外流现象十分严重，这对实现发展战略十分不利，应该引起第三世界各国的注意。

发展战略应该充分注意国防力量的增强。霸权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考虑在它们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加强自卫力量的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和全力支持许多亚、非、拉美国家提出“和平区”、“无核区”的合理主张。我们首先要求超级大国带头在事实上实现裁军。但是，在当前超级大国口头高唱“裁军”、实际大大扩军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在保证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的前提下，适当增强国防力量。这不仅为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所必需，也是为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作出贡献。

#### **第五，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要注意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缓和两极分化**

国民收入再分配，首先要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要发展经济，扩大再生产，必须积累资金。为了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保证人民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累所占的比例不能太高，消费基金所占



比例不能太低。当前，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是不可能的，实行平均分配更是荒唐和反动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比较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则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实行累进的所得税法，适当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负担。在工资政策方面，逐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规定城乡最低工资，适当缩小收入差距。在价格政策方面，控制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严禁投机倒把。国家根据财力，逐步增设城乡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设施；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增加就业；增加对农民和边远地区的贷款，改善他们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发展，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各阶级贫富过于悬殊，两极分化倾向严重的健康现象。

#### **第六，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与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相结合**

当前的国际经济状况，尽管已经存在着崭新的社会主义体系，但从总体看，仍然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配和控制着的不公正不平等的旧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受它们控制和剥削的主要对象。从五十年代，特别是从七十年代以来，以七十七国集团为骨干，第三世界国家奋发团结起来，在各条战线上，使用石油等原材料为武器，利用各种场合，为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英勇斗争。这是当今世界上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力量，也是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场斗争同当前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作为世界人民英勇斗争的两翼，密切结合，相辅相成，已经成为世界上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在这两场光荣斗争中，第三



世界各国人民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力军。赖有它的奋斗，第六届特别联大于1974年5月1日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1975年2月，发展中国家原料会议又通过了《达喀尔宣言》，正确地规定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针。从此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都构成这个世界范围斗争总战略的一部分，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总战略。第三世界国家在制订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都应力求符合这个总战略的原则和要求。同时，这两个斗争，特别是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每个胜利和挫折，都将影响各国发展战略实现的进程和程度。总的说来，第三世界发展战略正确实施的胜利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而后者的每一个胜利又将促进各国发展战略的胜利进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要保持较大的稳定性，但必须根据世界范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进展情况和本国情况的重大变化，随时作相应的必要的调整。

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寻求制订和实施能够体现上述方针、任务和原则的发展战略，并且力求为整个第三世界起些先进带头作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二）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战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



动。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了政治独立，国际垄断资本的旧殖民体系从此土崩瓦解。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利用自己经济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顽固地坚持对广大第三世界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为此死死抱住现存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放。这个国际经济旧秩序，就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体系。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历史经验昭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单单取得政治独立，而没有取得经济独立，那末，这个政治独立是没有基础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此其一；其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照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便不会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强大的民族经济，那么人民群众也只能依旧饱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而这是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的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决不能容忍的，他们一定会奋起斗争，摆脱这种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的状况。

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人民要进一步为获取经济独立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按其任务来讲，是战后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只有全世界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整个世界才能最终完全地彻底地消灭一切压迫、控制和剥削，从世界经济关系中根除一切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就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得到胜利，世界上才会有完全平等、公



平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人类比较遥远的，但又是最终一定会实现的理想。全世界劳动人民，包括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在内，必然会为这个最伟大的理想的实现进行持久而艰辛的斗争。

三十年来，第三世界人民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是从当代实际出发向着上述远大目标跨出的第一步，或第一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政治实际的主要特点是：（1）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还相当严重地存在；（2）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还不够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发挥得很不充分，还缺乏足够的示范作用和吸引力；（3）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前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是带有不同程度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力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第三世界的新兴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有些还没有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有些国家甚至还不存在现代无产阶级。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现阶段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其对象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破除它们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因此，这个斗争的性质在现阶段还属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事实也只能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第三世界国家所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限于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让各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一起参与决定有关国际经济问题，加速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来，即：（1）在行使各国经济自主权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霸权主义以任何名义（如所谓“自由世界”、“保障人权”、“非资本主义道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等等）把某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对本国资源享有永



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改革；有权对跨国公司实行监督和管理；有权参加世界经济的有关活动，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2）在国际贸易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贸易制度，确保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改善其贸易条件和地位，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要求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普惠制”，扩大其工业制成品向发达国家出口。（3）在国际金融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它们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无权地位，争取在这些组织中有更多的参与决策权，改善和加速资金转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的偿还问题上实行“免、减、缓”的办法。（4）在调整 and 改革世界经济结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和一部分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工业产权制度，促进有利于第三世界的技术转让。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要求减轻而不是消灭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它们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纲领性要求显然带有改良色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它同世界范围内的彻底的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有一定距离。至于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还是以后阶级斗争的远期目标。只有将来当这个斗争、这个运动在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先后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由第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担任领导，才能在斗争的更高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任务。

正因为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属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第三世界各国在国内必须严格控制和管理外国资本的活动，必须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必须保证和提高人民群



众的民主权利，必须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必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缩短贫富差距。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以支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大动力，来进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了完成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任务，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实行和加强相互间的集体自力更生，即“南南合作”。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各国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我们中间有的国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许多国家拥有各具特色的技术，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也大都有各自的经验可供别国借鉴。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南合作’，就一部分技术和设备的适用对路而言，其成效往往不亚于同发达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sup>①</sup>

近年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阿拉伯穷国的援助，亚洲国家和地区同中东、非洲国家的工程劳务合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安第斯、西非等大量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1980年4月非洲统一组织决定在2000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对增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互助合作，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和“南南合作”，是推动南北对话，促成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极其重要的伟大战略步骤。1982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南南合作发展讨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9页。





论会，使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三)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 若干理论观点的剖析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我们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现在有人（例如日本评论家北泽正雄先生）认为我们承认第三世界的存在，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衰退”了，已经“倒退”到第二国际水平了。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批评，而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诬蔑。毛泽东同志在七十年代中期，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原则，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sup>①</sup>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国际形势相结合而作出的科学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在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战略原则的鼓舞下，在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难道都不是事实吗？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胜利吗？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和“倒退”云云纯属无稽

<sup>①</sup>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之谈。

上述反对意见来自“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进行攻击的主要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他们轻蔑地嘲笑第三世界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什么“杜撰的”、“荒谬的”、“不合理”的。在1981年10月举行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某些西方代表曾经发表过这种议论。198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克劳斯曾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美学者国际经济讨论会上说：“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们通过各种努力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秩序，有可能是危险的”，它“将过分强调产品的分配，而不是强调生产”。对这种直接来自国际垄断资本方面的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恶意歪曲和攻击，我们必须坚决回击。

我们已经指出，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环绕它们的仍然是以剥削、掠夺和控制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基本上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制的翻版，是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它之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连一些发达国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不能加以否认。推翻这样的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顺乎民心、合乎国际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也是完全合理的。只有抵制和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正义事业，才是逆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 and 行为，才真正是十分荒谬的和极端不合理的。至于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说成是“杜撰的”，那更同三十年来第三世界人民奋斗史实相背离。试问：1974年联合国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尔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制定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重大的努力，难



道能说是凭少数人主观意愿“杜撰的”吗？这不是证明，这些斗争和业绩正是第三世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吗？至于说到“危险”，那倒有几分真实性，不过，有不安全感的只会是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来说，只会随着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斗争逐步取得胜利而增加安全感和舒适感。同样一目了然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善贸易条件、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善贷款条件、转让技术、改革国际经济结构等等，归根到底无非是为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增加生产，发展民族经济。以发展较差的非洲国家为例，七十年代它们的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为6.5%，大大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象肯尼亚那样一个在非洲还不算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64年的约3.48亿肯镑增加为1982年的34.2亿肯镑，十八年间增长了9倍；人均收入由1964年的104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420美元，十八年间翻了两番。面对这样的事实，竟然指责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在国际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从发达国家“多捞一点钱”。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莫大污辱；相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竭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才是真正为了在国际上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最大超额利润的“财富再分配”，而且这还是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来数百年之久的“财富再分配”的继续，从第三世界人民捞一笔血汗钱来供养它们的穷奢极欲的“天堂”生活！可见，劳伦斯·克劳斯先生的那些话不过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夫子自道”而已。

下面，我们要论及国际上一部分进步友人的有关言论。这些朋友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



主义对广大不发达国家极其残忍的压迫、控制和剥削，并为后者指点革命出路，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对于他们这一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支持和钦佩。但是，对于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若干理论和观点，我们却不敢苟同。现在，我们想对以萨米尔·阿明先生为主要倡导人的“依附论”，提出一点意见来商榷。

“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发达国家是这个体系的“中心”（或“宗主中心”），不发达国家属于体系的“边缘”（或“外围”、“卫星”）。“边缘”国家都是“依附”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它们自己的内部推动力，一切决定于“中心”国家，完全为“新殖民主义所控制”。它们“不会出现一种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当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淘汰和被取代时，这个过程首先不是发生在“中心”，而是发生在“边缘”地区。这种观点还号召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理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国际贸易是“不平等交换”，只会加强“边缘”的依附性<sup>①</sup>。

现在，我们撮其要者作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二次大战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国家蓬勃兴起，它们作为一大批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心”与“边缘”（这里，我们姑且用这个词，这个词用于现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显然已经不恰当了）的关系已经起了局部的质变。现在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主要是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的关系。尽管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采取新殖

<sup>①</sup>萨·阿明：《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1973年）。



民主义的手段，继续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和封锁，已经在本国内逐步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收回了海关、货币发行权和自然资源的租让权。它们已经不再是任凭帝国主义摆布的“附庸”了。由于第三世界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达国家对它的依赖从根本上说已超过了第三世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可以这么说，没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大量燃料、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大市场，大多数发达国家连一天也活不下去！更何况现在已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投资逐年增加。到1983年3月底，这三个国家在国外的投资总额达2,650亿美元，1982年所得收入超过270亿美元。同时，随着民族资本的成长，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日益缩小。例如外国资产在印度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1950年为55%，1959年降为36.3%，1976年再降到17.9%。在巴西100家最大企业的资产中，外资所占的比重从1968年的37%降为1977年的11.5%。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外国资本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是不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顾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上述变化，把已经取得政治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强大的新兴力量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说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边缘”部分，确实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依附论”认为，“边缘”经济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内部推动力”，它们只能受“中心”的支配，永远处于“依附”地位。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



盾性。”<sup>①</sup>人民，社会生产力，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它们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要求提高自己的发展水平。这才是第三世界国家真正的根本的“内部推动力”。长期以来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是以上述根本的内部动力来推动的。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自身内部推动力”，而必须到发达国家那里寻找发展经济的“推动力”是不合逻辑的，错误的。另外，“依附论”者在这里不免陷入了自相矛盾：他们一面认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内部推动力，一面又强调“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淘汰和被取代，这个过程首先不是发生在‘中心’，而是发生在‘边缘’地区”，而且认为第三世界发展民族资本是不可能的，只能直奔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边缘”首先发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甚至一下子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推动力又是来自何处呢？难道帝国主义“中心”会给“边缘”送去一个“淘汰”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应当指出，“依附论”在逻辑上陷于自相矛盾的原因，一是脱离当前第三世界的实际，二是离开了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依附论”者曾经强调，为了避免永久的“依附”，第三世界应该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幻想。第三世界国家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处理它们同发达国家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的关系，以自力更生为主，独立自主地参加国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际分工，适当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力求与发达国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还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坚定不移的根本政策，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可能也不应该同外部世界隔绝。相反，它们应该首先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开展南南合作，在此基础上通过斗争，由南北对话，逐步实现南北经济合作。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作为佐证，可以指出欧洲共同体在六十年代就同非洲国家签订《阿鲁沙协定》；七十年代又同非洲、拉美、太平洋地区53个国家签订《洛美协定》；1979年它同东盟五国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同年它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举行“欧阿对话”，甚至设想建立“欧非共同体”；1980年它同“安第斯条约组织”举行部长会议，商讨经济合作事宜。第三世界国家既然同西欧发达国家可以这样进行经济交往和合作，为什么它们不能同日本、北美这样做呢？事实上，它们已经在努力向这方面作，而且潜力很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保持清醒头脑，善于运用对发达国家又合作又斗争的“两手”，就不会在这种交往中覆舟灭顶。因此，结论只能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同“国际经济与世界市场决裂”。相反，第三世界国家应该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生活，打进世界市场，这样才能壮大它们自己的民族经济，增强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力量。所谓“决裂”是消极无为的有害口号。如果“决裂”政策真付之实现，那无异于自缚手足，而让国际垄断资本放手侵蚀，因为它才不让你“决裂”呢！这样就等于宣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将永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归于泯灭！这又是同“依附论”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



## 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学<sup>①</sup>

在1980年9—12月赴美讲学期间，我曾与霍布金斯大学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美国经济学家，就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学的问题举行座谈，广泛交换了彼此的看法。

座谈是从评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怀尔斯的《共产主义的国际经济学》一书开始的。

怀尔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经济的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主张建立和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这是不同于西方的所谓国际经济学的。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都已做了不少工作，并为它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曾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还曾设想要把政治经济学分成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

<sup>①</sup>本文为1980年9月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布鲁金斯研究所与美国经济学家座谈会上发言的综合记录。





输入。汇率。”第五部分则是“世界市场和危机”。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等世界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既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经济的著作。此外，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

斯大林曾一再详细论述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是有错误的），并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在论述当代帝国主义时，特别强调了经济危机与世界战争的关系，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在经济学界，人们也早就把世界经济作为“包括世界全体的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来加以研究。尤其是以瓦尔加等人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曾进行了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着不容忽视的缺点（主要是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长期缺乏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在世界经济理论的某些方面确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所谓国际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世界经济学有着本质性的区



别。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所谓国际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学。对于这种经济学（严格说来，是指它的研究客体），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也按照自己的观点把它作为世界经济学的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来加以研究，但它毕竟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更不能代替世界经济学。我们认为，西方的这种所谓国际经济学，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根本不同的：

**首先，目的和出发点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学，其目的在于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一步步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大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得到正确的发展，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要揭示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律性。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则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千方百计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和方法措施上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甚至力求扩大）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的统治。

**其次，研究对象和内容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尽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内容相当丰富，但它着重研究的是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国际收支，以及生产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模式等方面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则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体，兼及有关的上层建筑，重点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就当前来说，主要是研究世界上的各种生产方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比重和关系的变化趋势。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以世界经济整体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比国际经济学宽广得多，深入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世界经济学不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问



题。相反，在世界经济学中，国际经济关系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经济学中的某些研究课题，如国际贸易中的价格问题、国际金融中的汇价问题、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问题、生产增长的模式问题、生产成本的计算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如何推广到经济生活中去的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都必须进行研究，并从国际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吸收其科学成分，来充实自己的内容，以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

**第三，研究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由于其出发点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必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虽然有时也谈资本主义的弱点，但它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生产方式，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差，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低。这就使它不可能实事求是地看待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它不仅不去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对这种矛盾蓄意抹杀和掩盖。因此，它是不可能找到解决诸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方面问题的正确途径的。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为了揭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着重注意揭示事物的内部矛盾及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特别是世界范围多种生产方式（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和斗争及其运动的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本质上和规律性上正确说明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指出这些现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确乎出



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迄今还未能作出完整的科学的说明。例如，到底应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南北对话”在经济上可以和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加强团结和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问题、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是有待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的课题。我们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这些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正确解决的。

任何一种经济学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随着客观情况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过，它的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日益庸俗化和技术化。大家知道，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西方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学说。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赤字财政。这对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的推行所导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生产停滞、严重失业和通货膨胀长期并存的所谓“停滞膨胀”，就是这种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实已经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于是，供应学派和制度学派便在西方时行起来，货币学派也以新的装束登上舞台。而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当然都不可能从理论上找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案，但它们却有可能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使之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适应当前生产力状况，甚至容许和促进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办法。资本主义制度确已到了衰老的即垂死的阶段。但是，国际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坐待死亡，它必然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补救手段（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国内和国际资本的垄断、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政策，等



等)来苟延它的生命。而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发展变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尚且可以有所发展,具有严格科学性的、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当然更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战后,世界经济中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正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将到来。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与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就研究对象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又有所交叉。因此,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与西方经济学者进行一定范围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波士顿,加尔布雷斯教授在同我的谈话中曾提到,中国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证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必须结合起来。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做法是符合他所提出的所谓“两个动力机”经济的理论的。在费城,我同克莱因教授(198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他特别提醒我们一要注意抓农业的发展,二要注意搞计划生育。他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从农业起家的;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农业较早过关是它的一个突出的长处。在纽约,当我们与列昂节夫教授谈论计划工作时,他认为他的“投入产出”理论的某些内容是适用于中国的。他着重提到,挪威、荷兰、奥地利、法国、墨西哥在实行经济计划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中国参考。他以日本的“倍增计划”为例,指出搞经济计划必须注意世界市场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预测。他还谈到了为联合国制定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意见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与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探讨的问题很



多，它们之间应该而且可能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

总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国际经济学有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降低为国际关系学，从而使它不可能揭示世界经济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运动规律，并进而使这一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走上歧途，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势必阻碍对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合理成分的批判吸收，同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 世界经济问题综述



# 80年代世界经济、中国经济 和中日经济关系展望（节选）

——1982年11月24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演

## 一、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展望

现在，我对80年代世界经济作一下粗略的预测和展望。

首先，我想谈谈进行预测的方法问题。

当前西方学者所采用的预测方法很多，如概率计算法、趋势外推法、德尔斐法、移动平均法、计划评估法、模型模拟法、关连树法和反馈法，等等。这些预测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某些科学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运用。但是，我认为经济发展是由客观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此，我们在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展望和预测时，主要应该根据若干重要的经济规律，从当前实际出发，来进行分析和论断。在展望和预测80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势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如下经济规律和若干对世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然后运用上述各种方法中的科学成分作为运算和推测的工具。

**（一）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及其变形。**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正常情况下，呈现出由繁荣到萧条到危机，然后





再回升到繁荣这样一个定期的（例如10年或5年左右）周期循环。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经济生活加强了干预，固定资本更新也具有某些新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时，必须对这一规律及其变形有充分和正确的认识，并且要特别注意研究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及其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影响。

**（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营管理的不断改进，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预测8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的作用，曾因经济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弊病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但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进行，这些规律的作用将得到加强，并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

**（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对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在预测和展望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时，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因素的作用。

**（五）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战后，科技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尽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但以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为核心的第四次科



技革命正在加速酝酿。我们在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把科技发展及其可能的重大突破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

**（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规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我们在估计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时，一定要注意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要注意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注意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西方有人估计80年代中期将爆发大战，理由是那时苏联对美国将具有决定的优势。我们要认真研究这种可能性。至于局部战争，则连绵不断，我们也要密切注意和研究它们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

总之，我们主张着重依据在经济过程中起作用的上述客观规律和重大因素，来对世界经济进行预测和展望。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8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大致如下（我们在这里不作确切的预测）：

首先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滞胀”之后，1979年从美国开始，又先后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应付危机，克服“滞胀”，美国里根共和党政府采取了以供应学派为主、货币学派为辅的主张，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采取了货币主义政策，它们的目的都在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鼓励投资，促进生产，制止通货膨胀。法国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名义上实行自由社会主义，实际是基本上采取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干预，扩大国有化，增进社会福利，着重解决失业问题。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基本上治不了“滞胀”和危机的重病。里根政府自己承认美国经济深重衰退。财政赤字庞大，失业率创战后记录。减税并没有促进投资和生 产，而巨大赤字又将加剧通货膨胀。西欧各国的经济普遍陷入



危机和萧条。日本经济也困难重重。看来，在80年代，“滞胀”和危机交替发生仍将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一般说来，这些国家只能在低速（比如年增长率1—3%）增长中前进。当然，如果出现科技突破、能源替代或局部战争等情况，也可能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遇到能源或金融方面的较大变动，又可能再度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如果在80年代中期发生世界战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主要原因是世界人民，包括超级大国的人民在内，害怕和强烈反对核大战），整个世界经济的制度和结构将发生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已基本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剧烈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前进，这种不平衡状态在80年代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之势将更加明显，它们之间的矛盾将更加激化。

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虽然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有的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但他们在80年代将继续在经济改革中前进。它们的增长速度一般将高于西方国家，人民生活将进一步改善。

苏联、东欧，在80年代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增长速度将较70年代为低，但将持续增长。苏联军需工业比重将继续增加，农业和轻工业难于得到大的发展。但苏联东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集约化，在80年代将收到效果。总的说来，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将进一步缩短。

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初期的平均增长率，估计仍将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但它们的发展极不平衡，产油国和新兴工业国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6—7%，南亚和一部分非洲国家可能只有3%左右，甚至更低些。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负债过重、政局不稳，特别由于西方国家转嫁危机，跨国公司



加强垄断和剥削，80年代的经济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当前，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的矛盾正在加深。由于美国的抵制，南北对话遇到了重重困难。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挑拨和分化，又使南南矛盾有所增加。这些都将给第三世界为南南合作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增加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的今天，世界范围贫困差距的扩大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一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此外，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十分有利于它们贯彻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和加强相互间的合作。这些都有利于南北对话获得进展，并将促使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从总的趋势看，世界经济正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 二、80年代中国经济的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建设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曲折，特别是十年内乱，使我国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1倍。从1953—1981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8.1%。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这些事实又说明，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我国经济建设



的效益还相当低，我们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还很不够。原因在那里？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9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此，我国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79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8.7%。1981年，由于调整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农业继续丰收，轻工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生产略有下降，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继续得到提高，1981年，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比1978年增长43%。

1982年计划，根据着重进行调整、整顿，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规定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81年增长4%左右。要求农业和轻纺工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要由1981年生产下降转为上升。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要求消费部分增长5.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积累部分增长3.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项事业费用支出增长5.9%。做到财政和信贷的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从1982年1—10月的实施情况看，工农业生产形势喜人，市场活跃，对外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预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可能比1981年增长5%，其它各项计划都可以超额完成。1982年10月15日日本《每日新闻》以《在世界萧条中，中国经济扬眉吐气，1—8月工业生产增长9.1%》为题，报导了日本经济企划厅10月14日公布的7—9月海外经济报告，指出中国1982年1—8月重工业生产增长了9.8%，超过了同一时期轻工业的增长率8.5%，指出在世界一片萧条中“经济情况格外良好的显然是中国”。以上



情况表明，3年来我国政府实行的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通过对过去6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正确地决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大会规定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推向前进。大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

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从1981—2000年，经过4个五年计划，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本世纪末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用我们的日本同行的话来说，中国人民决心用两个“倍增计划”的奋斗来达到上述宏伟的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奋斗目标，我们决心在今后20年内牢牢抓住三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一、农业，二、能源和交通，三、科学和教育。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只要农业上去了，就会带动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能源和交通的紧张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要保证国民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加强能源开发，大力节约能源消耗，同时大力加强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建设。按照我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各国的经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人民大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关键之关键。因此，我们决心大力加强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训各种专业人才。同时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和技术改造、革新，组织科学和技术的“攻关”。

为了实现两个倍增计划的战略目标，我们在战略部署上决定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也就是说，80年代——准备，90年代——振兴。

80年代是我国实行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期。

正在举行的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讨论和通过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六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和联合，有重点地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六五”期间，由于我们把主要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高，大体上是确保年增长率4%，争取达到5—6%。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时要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继续合理地降低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比如说，降低到占25%左



右)，适当提高消费基金所占的比重（比如说，提高到占75%左右），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我国将于1983年开始拟订第七个五年计划。在1986—1990年的“七五”计划期间，我们将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开展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继续完成企业组织机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同时要继续着重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这三个战略重点。“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将略高于“六五”计划，比如说，大体上将力争达到年增6—7%。

1981年9月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些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经验积累。这十条方针就是：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六、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它们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从毛泽东思想汲取来的。

一年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这十条方针，使1982年的经济建设有着比1981年更好得多的进展。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





完全肯定了这十条方针，并且决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这十条经济建设方针，特别要注意解决以下4个重要原则问题。这4个重要原则问题是：

——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国家的重点建设必须得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一定要搞上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

——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巩固和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在城市和乡村都要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又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鼓励适当地发展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国营和集体企业中都要实行经营管理的责任制；在农村推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工商业企业中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这种计划管理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这种计划主要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两部分。此外，作为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不作计划，由企业根据价值规律自行安排生产。

——坚持自力更生，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



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国要大力扩展对外贸易，尽可能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积极地引进一些适用的先进技术，以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我们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行为。

80年代，我国将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实行“六五”、“七五”计划，作好准备，打好基础，迎接90年代新的经济振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20年翻两番，意味着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经过努力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试想我国从1953—1981年，尽管经济发展屡遭挫折，特别是遭到十年内乱那样深重的灾难，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8.1%。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有些虚假成份，但是去掉水分，年增长7%左右是可以肯定的。例如1979—1981年，是我国经济的调整时期，虽然放慢了建设速度，但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6.7%。日本从1957—1970年只用14年时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0.4%。我国人民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贯彻上述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特别着重技术革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借鉴日本和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坚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一定能实现。

### 三、80年代中日经济关系展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2,000年之久。不幸的是，



近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先后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和保守、反动势力的破坏。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中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27日终于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建交后，两国政府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以及其它协定。1978年8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它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几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发展。1982年，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我们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使两国人民的友谊进入“芳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的崭新阶段。

从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地发展。1981年中日两国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为1972年10亿美元的10倍，开创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新局面。日本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frac{1}{4}$ 。我国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和材料，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向日本出口的燃料、原料和农副产品，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在其它经济领域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我国利用日本资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向中国的六项重点工程、海底油田勘探和煤炭开发、续建大庆和宝山钢铁公司有关工程等，陆续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优惠贷款。由日本政府提供贷款帮助建设的石臼所港、兖州——石臼所铁路、北京



——秦皇岛铁路扩建和秦皇岛港扩建等4个项目正在积极进行建设。另外2个项目也正在进行设计和小规模施工。中日两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渤海南部和西部石油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日本方面正积极参加我国南黄海石油勘探开发的投标，并且希望今后能从中国就近进口更多的石油。

中日合作开发7个煤矿项目，计有山东兖州的鲍店煤矿、山东枣腾的蒋庄煤矿、山西古交的西曲煤矿、河北开滦的钱家营煤矿和山西古交的镇城底煤矿，计划年总产量2,100万吨。这些项目大多数已开始建设，进展顺利。

在合作经营商业方面，也已胜利起步。中国土畜产总公司、机械总公司和辽宁省已先后在东京同日方有关企业成立了合资贸易公司，双方在北京也开设了3家合资贸易公司。

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双方互设常驻代表机构日益增多。现在日商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重要城市已设有日方常设代表机构一百多家。中国方面的粮油、土畜产、纺织、轻工、工艺、技术、机械、化工、五金矿产等十多个总公司和中国银行也已派出代表到日本工作。

1981年初，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中由于宝山钢铁公司等问题，曾一度引起波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正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日方派遣技术人员到中国，或者由日本企业对中国有关企业负责实行技术指导，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形式。例如1982年1月，日本本田技研公司同四川的嘉陵机器制造厂签订了合同，规定由本田公司除提供一部分设备和零件外，派遣技术人员为提高嘉陵机器厂制造摩托车的质量和降低成本而进行合作。又如日本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从1982年1月起，开始对北京第二汽车厂制



造2吨重小型卡车进行质量管理的指导。

我国利用日本资金还采取了在国外募集债券的新形式。如1982年1月22日，我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日方在东京签署了一个筹募100亿日元债券的合同。到1月29日，就有三十多家日商缴纳了这笔款项。条件是：期限12年，利率8.7%。所募集的资金由中国用于自主地开发稀有金属等方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着信心。预计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原则下，必将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采，更加富有效益，获得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根据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到1990年，中日贸易额将从现在的一百多亿美元增加到二、三百亿美元，即增加1—2倍。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开辟了新的途径。中日两国银行之间的资金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从日本引进设备的合同项目必将以较大幅度增加。随着两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国之间的海运和民航事业也将迅速发展，从而中日海上与空中桥梁必将越来越宽广。中日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将越来越活跃，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因此，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预计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80年代这一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笔直的。它必然会遭遇这种或那种障碍，也必然会发生曲折。首先是因为，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日本有些势



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些势力，一直在阻挠和破坏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他们念念不忘早已破了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染指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他们死也不承认过去加诸中国的战争是侵略，对侵华战争的元凶和战犯顶礼膜拜，千方百计地颂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精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以及其他各国人民对此必须加以严重警惕。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复交后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交往的发展都是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不断排除干扰和克服障碍的结果。今后如果真要而不是假要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往来，就必须继续认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①</sup>这是毛泽东主席讲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将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谁都破坏不了，阻挡不住。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现在全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正确方针，奋起努力，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真是前途无量。只是眼下资金不够充裕，技术还比较落后。日本经济比较发达，技术和经营管理比较先进，但是缺乏资源，特别是缺乏能源，市场狭窄，对外依赖性大。因此，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充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只要我们两国人民根据两国政府共同认可的“友好合作，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方针，齐心协力，排除障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2页。



---

碍，80年代直至90年代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一定会出现非常可观的辉煌的新局面，这是肯定无疑的。

谢谢在座的朋友们！



# 中国经济改革





##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自从1979年我国政府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工作后，中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以1970年固定价格计算，总计达到6,619亿元，比1979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992亿元，比1979年增长8.7%。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我国经济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对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部门和地方对调整方针贯彻不力，基建战线仍然过长，行政管理费和非生产费用没有做到应有的压缩。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基建开支和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这样，就出现了财政赤字，信贷不平衡，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使我国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危险。因此，中国政府于1980年年底决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这个大调整，决定该退的要退，而且必须退够（例如某些重工业项目），该上的要积极地上（例如农业、轻纺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险，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从长远来说，这



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真正摆脱过去“左”的思想束缚，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使国民经济避免再次出现比例的严重失调，从而能够持续健康地稳步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政府这次关于实行经济大调整的决策，正是1979年提出的调整方针在新情况下的继续和发展。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以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我们对这点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认识有片面性。现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生产力低正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总任务。这就纠正了过去的偏差，使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发展有了保证。其次，社会生产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着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为着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现在我们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是要逐步改变经济结构，着重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煤、电、油等能源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并着重现有企业的挖潜和技术改造，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努力缩短建设周期。同时，要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降低近年来过高的积累比重，逐步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5%左右。必须按照正确的比例关系发展国民经济才能有真正的持久的高速度。

经济调整是中国今后几年内的中心任务，但同时必须进行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必须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者两而。整必须相辅而行。不逐步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要完成调整任务是困难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我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我国目前存在的一小部份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



和集体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将长期存在。这种多种经济成份的长期存在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还只能是一种商品生产。它的产品，不论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还都是商品。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它将在计划指导下有效地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服务。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不合理地利用市场机制，利用价值规律，不尽量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那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不能搞活，国家计划也不能很好实现。而要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我们就应该保护和鼓励计划指导下的适当的竞争，打破那种划地为牢，按行业划线，各自自成系统的垄断局面。只有这种合理的竞争，而不是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合理垄断，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厉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加企业收益，提高经济效果。

此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必须奉行的一个重要方针。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沿袭了苏联30—50年代的模式。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不能适应地方特别是企业的具体情况，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的利益不能得到应有的照顾。这是迄今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弊病。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外国经济体制进行试点，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权限，计划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财政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价格体制以及外贸体制等等。



这里，一项关键性的改革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社会主义企业应该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自负盈亏，逐步做到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享有生产的计划权、经营管理权、产品的销售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两年前从四川省开始，目前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正在进行着这种试验。实践证明，上述试点单位在经营管理、产量、产值、产品质量、盈利和职工生活改善方面都比非试点单位好得多。这项试验今年还将继续下去，以便积累更多的经验。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它实质上涉及到企业的所有权问题。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它的生产资料应归全体人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它的生产资料应归这个企业的全体公民集体所有。但是，由于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再加上我们没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封建式的家长制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和普遍。结果，许多生产单位的广大职工，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为企业的完全的主人。他们还没有享有企业的生产管理权和产品的分配权。而这里的前提必须是企业享有应有的自主权。这个自主权扩大了，随着职工代表大会制的建立，职工逐步享有各项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如对厂长、经理的选举权、聘任权、罢免权以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生产计划权、经营管理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分配权等等。这是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保证。

当然，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都必须服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在当前我们大力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消除潜在危险的时候，更不能削弱国家应有的集中，不能损害国家的全局利益。



最后，我国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必须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全国和各地的各项优势，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发扬各种各样的长处，避免各种各样的短处。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推行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之间的联合，实行专业化协作，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经济渠道，逐步形成一系列大、中、小型的经济中心，破除各种不合理的封锁和垄断，极大地提高经济效果，增加经济实惠。

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调整 and 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在完成上述调整改革的任务之后，中国经济将会以持续的较高速度稳步前进，对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作出较大贡献。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继续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这些光荣艰巨的任务。

（《中国企业》，香港，1981年）



#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 的几个理论性问题

##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还处在少年时期

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算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今不过六十几年的时间，不象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六十几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很短暂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少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为社会主义制度描绘了一个大体的轮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共产主义最初尝试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几天。马克思虽然对巴黎公社的实践作了杰出的总结，但它存在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列宁亲自领导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列宁对此也作了很好的总结。在列宁这一时期的著作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但列宁去世的太早了。后来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在他领导下，苏联确实建成了社会主义，国



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批国家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时的苏联就成了这些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榜样。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大家都纷纷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实际上，除了南斯拉夫被情报局开除以后另搞一种模式之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按照苏联的那一套做的。

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诞生以来只有六十多年，在我国则只有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不少的失误，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我们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到底怎么搞法，这里就有一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从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料是很不同的。他们预料，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第一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是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获得成功。后来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低的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获得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马克思尽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共产主义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等等，他们确实设想这样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商品、货币这些东西了。例如马克思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



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sup>①</sup> 恩格斯同样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sup>②</sup> 而后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证明，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和货币还需要长期存在。

由于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一劳永逸地为社会主义社会设计出一种具体蓝图。这种具体的模式，连同它的经济体制在内，对我们来说都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刚刚产生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摸索了千百年的时间，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摸索了很长的时间，走过很多弯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要打倒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实现这样一种根本转变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更加需要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不走一点弯路是不可能的。

那么，所谓经济体制究竟是什么呢？经济体制包括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各种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的东西。比较具体地说，在社会主义中国，它规定计划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组织和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规定中央与地方管理经济的职权，规定各个部门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职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这一级或这一类经济组织与那一级或那一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经济组织与它们的组成人员（职工、社员）之间的关系等等。

①《资本论》第2卷，第8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经济体制涉及到生产关系，或者说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经济体制一经确立，又会反过来对生产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发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对所有制的影响，如果在经济体制上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里的职工没有什么管理权力，而这种权力完全掌握在厂长或书记手里，那么就会影响到所有制的实质，使这种所有制实际上可能变成厂长或书记所有制，而不能说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又如，对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如果经济体制不是真正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可能丧失，人们之间同志式的互相关系就可能变成一种主仆关系。经济体制还直接影响到产品的流通和分配。例如经济体制对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的规定就会产生这种影响。

经济体制也涉及到上层建筑，或者说，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就经济体制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例和制度来说，显然是属于政治、法律的范畴。例如，经济体制所规定的管理机构的设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等等。在这方面，经济体制中包含有政府组织和许多法律形式的规定。

上面我所谈的关于什么是经济体制的问题，目的并不是要给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而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探讨。因为在讨论中，有些同志把经济体制说得很广，似乎包括了整个的生产关系；另外有些同志则把经济体制说得很窄，好象跟政治毫无关系。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究竟什么是经济体制，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弄清楚，否则我们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就不大容易有共同的语言。



## 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经济体制包含着很广泛的内容，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这里，我只想就两个主要问题讲点个人的意见：一个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条条和块块的关系问题。下面先谈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从历史上看，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划或计划，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庄园的管理也是有一定的计划的。大观园里的王熙凤便是这样一个管理能手。甚至对一个封建国家，也有过越王勾践那样的“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宏观长期规划。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企业里都有严密的计划。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商品生产最发达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迫使代表整个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采取各种国家干预的手段，包括制定形形色色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从凯恩斯学说提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为盛行。现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美国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他们的国家计划；就连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西德政府，实际上也有一定的经济计划，它对全国的劳动力就实行从中央到各邦的集中和严格的管理。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同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计划，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只有在这个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基础上，才能够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利害关系的对立和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由于它是最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从根本上说，只能导致社会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而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真正的计划调节。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并不排除竞争，相反，它扩大竞争的能量，因而更加激化了竞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总是以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才有产生全社会的真正的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是和商品生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商品经济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简单商品生产。在罗马奴隶制度时期，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作为会说话的生产工具，也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但在奴隶社会和随后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都还只是附属品。商品经济既为封建社会服务，也对封建社会起着瓦解作用，最后终于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到这时才取得了最完备的形态，不仅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了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统统成为商品和货币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经济，还存在着少量的作为补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在各个经济单位之间，都还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经济活动中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社会主义生产还必须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社会主义经



济还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关系。但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更不能把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我们有些同志怕搞商品生产，以为一搞商品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完全是误解。10年内乱时期就是把必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商品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并不一定会出现资本主义，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如果管理不好，市场机制也会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一种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制约，就是说，由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起某种鼓励或限制的作用，许可或禁止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机制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补充计划的不足，可以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可以把经济生活搞得更活跃，更加丰富多彩，从而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还存在着少量的个体经济的时候，不仅生活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基本上也是商品。市场机制在计划指导下，是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起积极的调节作用的。

斯大林在其晚年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的发展。但斯大林即使在那时也仍然坚持：一，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二，市场不能起调节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斯大林的这两点看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即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没有计划管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但也不能没有市场调节作为计划机制的辅助手段，否则，国民经济就会搞得很死。只是片面地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就不能把经济搞活。反之，片面地强调市场调节，国民经济就会被搞乱。要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就必须既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加强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又要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包括它的调节作用。

陈云同志在1956年就曾讲过：“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肯定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明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前一个时期的讨论中，纠正了过去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市场不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好的，是主流。但也存在一点片面性，主要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作用，而对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计划经济这个方面有所忽视。现在我们强调一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几年



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又有一种忽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片面性。我认为，上述两种片面性都是应该注意避免的。

在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同时，计划工作本身也需要改进。国家计划必须根据社会需要来制定。所谓社会需要，主要是指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消费品（包括文教卫生）的需要，此外有国防和出口的需要。国家计划要抓全局性的东西，包括基本建设规模，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等等的关系。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那些产品，比如粮食、棉花、油料、钢铁、能源等等，都必须由计划来控制，列入指令性的计划。要采取领导、群众代表、专家三结合，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多次反复协商的办法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比较地切合实际。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还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发挥价格、利润、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 三、中央、地方和企业，以及企业领导 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央、地方和企业，以及企业领导和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它主要涉及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这是集权和分权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握有集中的大权，同时也应使地方分享一部分权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列宁很重视发挥各地区的首创性和主动精神。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



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充分顺利地发展。”<sup>①</sup>又说：“对纯粹地方性的（区域的、民族的等等）问题实行官僚主义干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sup>②</sup>他坚决反对中央对地区性的事情乱加官僚主义的干预，主张地方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拥有广泛的权力。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展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苏联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倾向，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我国建国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过去总的倾向是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分权不足。对此，近年来已作了一些调整。过去不论在部门管理还是在地区管理方面，都容易产生各自分割的现象，不利于实行国家统一计划管理。因此除了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权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要打破条件（部门）、块块（地区）的束缚，形成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合理的经济联系网络。

**第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这也是集权和分权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前，经济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手里，而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企业几乎处于毫无自主权的地位。国家对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实行统一包干制，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由国家调拨，产品由国家包销，盈亏由国家负责，这就极大地压抑了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弊病。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扩大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力，加重它们的责任，改变企业“吃大锅饭”的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0页。

②《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页。



现象，调动企业的主动性。但是，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只能是相对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必须接受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说，要使国家对全国经济的集中领导和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挥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减轻了对企业进行具体管理的繁琐负担，可以更多地考虑和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并使企业的重大决策不致脱离国家利益的轨道；而企业也摆脱了国家施加的过多束缚，调动了企业的主动性，又可以给经济工作注入更多的活力。

**第三，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群众的关系。**这是在企业内部的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企业内部，应该强调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指出：“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sup>①</sup>列宁所讲的，就是群众对领导者应当有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同时，列宁也强调纪律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sup>②</sup>又说：“无产阶级应当以严格的求实精神和从大工业的利益出发，来实际地解决劳动人民的纪律问题、组织问题和领导权问题，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sup>③</sup>

有的同志担心在企业里由职工代表大会行使选举权，罢免

<sup>①②</sup>《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

<sup>③</sup>《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2页。





权和监督权，会不会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变成集体所有制企业？我想是不会的。全民所有制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强调职工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否则，就会妨碍职工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职工群众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就会影响到所有制的实质，使其不能充分体现出生产资料真正属于全民所有的性质。当然，我们在相信职工群众的同时，也要教育职工群众必须服从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

#### 四、苏、南、匈三种经济模式

为了搞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认真地参考外国的经验。广义地讲，所有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都要参考借鉴。狭义地讲，我国和东欧国家在建国初期都是沿袭苏联的那套经济体制，有着更加相似的经历，因此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从目前的情况看，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三国的经济体制，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些国家的不同模式，对我们都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苏联模式：它也是大多数东欧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模式。苏联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这是在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当时苏联处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因此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严格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体制，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经济力量集中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体制，苏联才能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很快地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技术改进，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并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奠定了物质基础。可见，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当然，后来的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有着很大的弊病。

就苏联经济体制来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都搞了改革。赫鲁晓夫扩大了地方的经济权力，注意了市场和利润的作用，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以至建立了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跨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但搞得草率鲁莽，结果，他搞的改革基本上失败了。勃列日涅夫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某些错误，比较慎重地进行改革。他注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在计划体制和方法方面作了较大的改进。但总的看，苏联近二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迈的步子很小，成绩不大。

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建国以后，也跟着苏联走了几年。1948年被情报局开除后，另找了路子。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特点，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当然有不少缺点，但我觉得这种模式有两大贡献：一是突破了原来的思想束缚，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尽管南斯拉夫在强调市场作用方面有一点过头，但这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毕竟是一个重大贡献。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体现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体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企业里实行工人自治制度。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或工人代表大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选举或招聘厂长，也可以撤换或处分厂长。职工群众在企业管理方面享有广泛的高度的民主权利，我认为这也是南斯拉夫的一个重大贡献。

匈牙利模式：匈牙利在很长时期内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促使匈牙利领导人下决心搞经济改革。他们既



看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缺点，也看到了南斯拉夫模式中的一些优点。因此匈牙利能够有比较地、有准备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形成了相对来说是较为有效的经济体制。例如计划同市场的关系，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匈牙利都处理得比较恰当；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也比较注意发扬。匈牙利的经济发展是很有成绩的。当然，匈牙利的经济体制也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由于匈牙利是个小国，资源贫乏，对外依赖性很大，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在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不管是哪一种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都还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都还在继续进行。而且应该看到各国的具体国情很不相同，我们在借鉴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时，都要考虑到这一点，绝不能生搬硬套。

## 五、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

几年来，我们经济界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是很有成绩的。但总的看来，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和讨论都还很不够，需要我们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为此，我有如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我们十分需要认真地读一读马、恩、列、斯、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例如列宁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问题，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关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关于发扬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包括工人参加管理的问题，都有很多精辟的



论述。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这些我们一定要很好学习。

另一方面，苏联以及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他们研究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和文章已经很多。我建议把这些东西大量翻译或摘译出来。这些国家对于经济体制问题，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有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在它们那里是老问题了。我们把他们研究的成果翻译过来，可以作为我们重要的参考材料。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需要我们翻译过来作为参考。

**第二，要调查研究。**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新现象、新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许多新的问题出来了，到底怎么办？工厂里面也有许多新问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以及外贸体制方面也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第三，要认真总结经验。**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误和教训。近三年多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实行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都应该加以认真的总结。

**第四，要提倡进行多方面的论证，也包括反面的论证。**兼听则明，我们应该多听听反面论证的意见。我认为，科研机关同一般宣传机关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科研机关除了宣传和论证党的方针政策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些带规



律性的东西。科学无禁区。科研机关应该唯真理是从，更富有创造性，更加无所畏惧。

总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有着极其远大而灿烂的前景，真如“不尽长江滚滚流”。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曾经明确地指出过，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样“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从来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到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曾想到，说我们可能根据某种预定的指示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sup>①</sup>在马列主义的光辉指导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和探索，仍然是摆在今天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我国理论工作者真是任重而道远。这里我引用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今天的心境和方向可能是合适的。

---

<sup>①</sup>《列宁选集》第3卷，第569—570页。



# 认真改进我国的 经济计划工作

——1980年4月3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  
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

**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已有近30年的历史。**尽管经过多次波折，但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总的来说，30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我国经济经受了10年内乱之后，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满怀信心地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总结过去的经验。

从国际范围来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但还处于少年时代，需要继续探索前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寻找它们各自不同的道路曲折前进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几千年剥削阶级统治的废墟上，建设没有剥削制度、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史无前例的，无章可循的，因此更需要进行长期的创造性的探索 and 追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才30年，受到一些挫折，是由于缺乏经验，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严重的“左”倾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正确方针，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态度自觉地全面地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前进的。



**二、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斯大林在1952年明确地指出了这条基本规律。在他的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sup>①</sup>我认为斯大林所表述的这条规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根据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建议把它稍加补充，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如下的表述：“在扩大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用先进科学技术积极地武装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特别是发展商品生产，顺畅流通渠道，坚持按劳分配，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表述对不对，请大家考虑指正。我们制定长期计划，必须体现这个基本规律的全部内容和各个环节。

**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结合本国的实际，走中国的道路。**在制订计划和进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必须遵循以下几条主要规律：

1.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和运动的状况。生产关系改变得太快，就会犯“左”的错误；如果太慢就会犯右的错误。例如，我国实行三大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恐怕是过快了。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不适应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经济基础的，实践证明它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sup>①</sup>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1页。



2. 要不断发展和巩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律。但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经济部门，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密切相关的。集体所有制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所谓穷过渡）容易损害群众的积极性，这方面我们曾吃过大亏。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保留少量的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活跃经济生活的。生产资料所有的结构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而起变化，越来越利于公有制的扩大和巩固。

3.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的计划经济。

4. 要十分重视利用价值规律。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生产（包括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基本上是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构成独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剥削剩余价值即利润），它总是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来完善我们的生产（如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等）和流通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用意就在这里。

5. 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封建主义是按地权和权势分配，资本主义是按资本分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按劳分配，做到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缺劳保障其生活。社会主义必须严格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平均主义、铁饭碗、大锅饭不是真正的社





会主义分配政策，因为它们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穷社会主义”的纲领。

6.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逐步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确定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指标时，不能先考虑或者只考虑中间产品（如钢、机器等），而应该首先考虑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包括衣、食、住、行、用、文教、科学、卫生等）。

**四、长期计划必须体现上述规律，使之成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首先要研究和制定一个适合国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又要照顾到80年代、9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的大体发展趋势。长期规划的内容包括国土整治、控制人口、工农业生产、就业、工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物价、信贷、能源、交通运输、教育、科学、卫生、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经济法等等。

#### **五、当前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1.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要纠正那种只有生产才是积极因素，消费是消极因素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生产的因素之一，衣、食、住、用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教育科学是劳动力更高级的再生产。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通过教育，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更能掌握先进技术、更有管理能力。通过改善生活，加上政治思想工作，使劳动者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过去20年来，积累率偏高，对消费注意不够，效果不好。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积累率一般不超过25%，这是很好的。资金积累要用得恰当，基本建设战线要大大缩短，集中力量搞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其余着重搞现有三十多万企业的技术改造。



2. 决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实事求是,从我国的实际可能和需要出发,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速度不要带水分,要求有经济效益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速度要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相适应。勒紧裤带的速度一般说来是军国主义的速度,不是社会主义的速度。

3. 在经济结构上,要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和服务行业,由原来的农、轻、重,变为农、轻、服、重。不注意发展衣、食、住、行等服务行业,就是对人民生活重视不够,就是忽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重视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最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对中小企业,特别对个体小企业和服务业予以大力发展,收效很好,值得借鉴。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根据我国人口多,要求就业面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的特点,要特别注意“适用”两个字,不一定非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不可,可以高、中、低(略高于我们的)并举,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并举,逐步由劳动密集过渡到技术密集。引进先进设备,不在多,重在用、改、创,着重引进软件和专利。在这方面,日本人的引进、改进、创新、输出的整套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4. 计划与市场调节。一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但是,因为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必要的,所以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农业主要产品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指标外,大量的小商品可以由企业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实行自发的调节。此外还应当注意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储蓄、保险等经济杠杆,实现指导性的计划指标。这样,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可以逐步作到统(计划)而不死,活(市场调节)而不



乱。

5. 科学教育在长期计划中比重一定要加大。和国外比较,我们在这方面太落后了,甚至比印度还落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不提高,不进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教育制度要改革。要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和彻底扫除文盲。除正规学校外,要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要着重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各级教育都要着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要大力注意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反对只重死背死记的填鸭式教育。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适当结合。

6. 建议计划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力进行改革:

①计划工作要把人民的需要(全国范围内再加上出口和国防)作为出发点,从人民的衣、食、住、行、用、教育、科学、卫生等各方面进行预测,先拟定社会需要的最终产品的各项指标,再根据这些需要拟定中间产品的指标。

②要把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结合起来,以长期计划为基础,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方针和目标。目标要力求全面和完整些。建议国家计委的工作重点放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定长期计划方面。

③制订计划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多次上下反复,使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在工作中,要吸收有关的经济和技术专家和群众的代表,倾听他们提出的意见、问题、困难和愿望。对重要专题和重大项目必须经过周密调查和反复论证。

④计划方法要进一步现代化,要吸收当代的投入产出法、运筹法、系统工程学、计量经济学和未来学等有用的部分,利



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的计算，而不是靠拍脑袋出指标和定项目。在这方面，苏联、法国、日本等国都有许多先进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建议由国家计委组织研究班，对计划工作人员进行普遍轮训。

⑤计委应吸收专家、群众代表（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代表）作为委员，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建议国家计委增设世界经济研究室，或在计委经济研究所内加强世界经济室，及时研究和吸取国外有关计划经济的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应用到我们的计划工作中去。

#### **六、我想对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市的经济发展规划讲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全国主要的文化中心。全国解放时，我们提出消费城市应当改变为生产城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北京无论如何首先应当发挥它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和优势。它应当成为文物荟萃、环境优美、交通方便、供应丰富、秩序优良的社会主义模范城市，使中外人士来到北京，就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显出我们既是文明古国，又具有现代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宏伟气概。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还缺乏比较完备的长期规划，特别缺乏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方针。在北京，重工业再不宜添建，污染和耗能过多的轻纺工业也不宜多建，栽草植树和街心公园要普遍提倡，服务行业要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服务态度和清洁卫生要大大改善。城市建设一定要服从总体规划 and 标准设计，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区都不能各自为政。北京市应该在郊区逐步建立若干环境优美，有良好物质文化设施的卫星城镇，适当分散人口。总之，要把北京真正建设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壮丽的首都，成为国际交往和国际会议



人心所向的场所。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它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良好的港口，又是文化科学中心。我认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应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海应该以它的优越技术和较好的管理经验传播和支援全国，全国也应尽其所能支援上海。可以考虑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建立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经济区。上海的经济力量日益雄厚，全国通过它扩大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来往，使它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之一。

天津具有自己的工业、水陆交通和文化科学的优势。它应当面向华北、西北、面向国际市场。也可以考虑以天津为中心，逐步建立华北、内蒙各省区的经济区，建立许多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企业。天津的经济实力随之日益雄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就会越来越重要。

其他沿海城市，如大连、青岛、广州等等都应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起带动内地、面向国外，把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结合起来，以壮大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些设想不一定切合实际，谨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 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初升的太阳。它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只有六七十年，经验不多，常常失误甚至摔跤，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已经非常辉煌，前程无量。现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凭着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按照本国的国情，探索自己的道路，建设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是正确的方向。列宁说过：“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400页）。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同时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中央才决定我们必须坚决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这条道路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们在建国初期，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生的社会主义生机蓬勃，发展很快。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的企业并改变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采取了一系列过渡的形式逐步地进行。在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的特色。但由于我们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没有经验。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止，社会主义友邦苏联给予我们巨大的援助。所以当时我国对外实行了所谓“一边倒”的政策，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一位苏联朋友时形象地描述的：“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跟着爬，我们跟着你们爬就是了”，几乎全部照搬了苏联五十年代的那一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苏联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管理经济的权力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唯一，轻视以至排斥市场机制，主要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当时的苏联（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进攻的国际环境中）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并且曾表现出巨大的积极作用。苏联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是同它采用这种经济体制分不开的。但是，苏联这套模式有不少缺点；经济生活统得过死，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于发挥，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人民生活改善较慢。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搬用了苏联模式，一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指出了这些缺点，主张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两条腿走路，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不要“重、轻、农”，而要“农、轻、重”。所有这些论点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可惜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些正确的改革方针和步骤都没能得到贯彻。我们对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虽然也曾在集权与分权问题上反复地作了些调整，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革。相反，我们对于五十、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一些比较合理的经济改革，却一概称



之为修正主义，要批倒批臭，其结果就不能不落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深重的泥坑里。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且采取了适应新情况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重大国策。五年来，我们首先在农村，接着在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革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这五年同一九五三——一九七九年的二十六年相比较，我国社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率由百分之七点九提高到百分之十八点二，国民收入每年平均递增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点一；人民消费水平（剔除物价上涨因素）每年平均递增率由百分之二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七点二。

邓小平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到二〇〇〇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按照价值规律和其它经济规律，在采用行政或法律手段的同时，主要应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有





计划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根据这个认识，并参考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我国正在对现行的基本上从苏联搬来的经济体制作比较带根本性的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改革进展顺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和建立农工商联合体为两翼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农民生活大为提高。现在全国农村要求扩大商品流通，开拓城乡市场，提供物资支援和智力支援，从而迫切要求城市经济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大发展的新形势，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搞了一些试点和探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现行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经济的潜力还远远没有挖出来，从而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十分迫切和重大的任务。

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弊端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这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首先，它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水平这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对生产关系的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一大二公”，认为越大越公越好，错误地把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错误地把许多集体经济强迫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或者当作国营经济（如供销社）来经营；错误地把社会化大生产曲解为大呼隆的集体劳动，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劳



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了生产力。

在生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流通方面，片面强调指令性的产品调拨，忽视市场机制，不注意运用价值规律，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从而使经济生活十分死板，人民生活非常不方便。

在分配关系上，错误地实行吃“大锅饭”、端“铁饭碗”那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违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第二，现行经济体制实际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我们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过去我们长期没有改正“重、轻、农”的不适当的产业程序，为了“超英赶美”，片面地要求经济高速度发展；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积累率过高，过快地发展重工业，错误地实行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挤了轻工业、农业和文教科研事业，使消费品的供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科学技术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重工业产值增长八十九倍，轻工业产值只增加十九倍，农业产量只增长二点四倍；科学研究文教卫生方面的投资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占比重偏小。

第三，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广泛地存在着、并且不断地扩大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实行计划管理时，我们根本忘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的



教导，片面地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夸大指令性计划和产品调拨，而不懂得认真利用价值规律去改善经营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力求少投入，多产出，提高经济效益。多年来我国各种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严重脱离供求关系，以致不少商品供应紧张，但有些商品又严重积压，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巨大浪费。许多企业长期亏损，国家因为物价不合理所给予过多的财政补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包括指令性计划在内，如果不很好利用价值规律，不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或经济杠杆（如利润、税收、信贷、价格等），而单凭行政命令办事，由政府机关直接管企业，结果必然把企业管得很死，经济失去活力，势必影响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人民生活难于较快提高和改善。今后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的教导，必须充分认识遵循价值规律是搞活经济和完成国家计划的重要的法宝。

第四，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应有适当的限度，而且这个限度将越来越大的规律。这条规律构成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国家将自行消亡这一规律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刚从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接收过来，加之留用人员的旧思想、旧习惯还比较浓厚，那时国家对企业直接插手进行具体管理，以便使官僚买办资本的老企业较快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国家对国营企业的管理范围也要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的标准，就是在计划指导下企业不能搞死，应该生机勃勃。随着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人员的经验日益丰富和成熟，以及全体职工思想觉悟的日益提高，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就应该逐步地放松，并逐步地增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它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由它自己在国家计划



指导下，掌握人、财、物、产、供、销的各项管理权力，向国家交税，自负盈亏，而不是由国家统统包下来，使企业逐步在法律上成为法人。实行权责制相结合，按照经济规律，主要用经济手段，办好企业。恩格斯说过：“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法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当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前景，国家对企业 and 职工应当简政放权。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为了克服以上这些弊端，经过几年来的体制改革试点和探索，已经初见成效，但还远远没有从根本上给以解决。赵紫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的改革，也正稳步开展。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是赋予企业以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通过改革，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持久地充分地发挥出来。可以预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出现新的飞跃。”

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它的目的就是祛除现行经济体制中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即阻碍我国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消极东西。这里面包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和不适应于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它涉及的方面很广，触及的部位很深，直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但是，这种改革，或者说



这场革命，绝对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那种用暴力行动式的革命，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人民内部，用行政、法律手段和说服教育方法，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只能是为了促进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决不能是为了其他。它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一面我们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决不能拖延不改，但同时又必须稳步地妥善地进行，而决不能盲目冒进，一阵风，一刀切，以致欲速不达。

从当前实际的全局出发，这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着重抓住哪些主要环节呢？我们认为：

第一，必须坚决和稳妥地改革计划体制。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地、坚决地依据和充分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结合起来，克服过去那种把这两条规律对立起来的陈旧和错误的观点，这是改革计划体制的关键和基本出发点，为什么多年来我们的计划管理多次反复地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死了就放，乱了就管”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旋涡里而始终拔不出来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意识地满足于用行政手段处理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利用经济手段，特别是运用价值规律与计划管理相结合方法来发展经济。不是充分根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来制订和执行计划，我们的企业就永远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国家计划的重点应该放在切合实际地确定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决策和重点项目，并搞好综合平衡（特别抓好积累率与消费率的比例，和四大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



衡、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手段，来实现国家计划。必须做到站得高，看得远，真正做到宏观方面管住管好，微观方面放开放活，把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站得高”，就是要面向世界，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从世界看中国。所谓“看得远”，就是要面向未来，从今后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内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前景，依据比较科学的预测，来制定长期和中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同志同英国的蒙哥马利谈话时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指英国——引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0页）现在，党的十二大已经决定到二〇〇〇年，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战略目标。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预计，到二〇五〇年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振兴争取达到那时最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为此努力奋斗。我们应该根据这样的远大目标，来制定和部署长期和中期规划。这也是我们计划工作的重点所在。

要做到宏观方面管住管好，微观方面放开放活，在计划体制方面要着重进行如下的改革：

（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彻底抛弃计划只有指令性计划的传统观念。



(二) 国家要充分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等经济杠杆，同时制订和实施一些必要的经济法规，加强宏观（注意：不是微观）方面的指导、控制和管理。

(三) 不论指导性计划，还是指令性计划，它们的制定和执行都要充分运用价值规律，适应市场供求关系。

(四) 国家计划部门应重点抓好中期和长期计划。

(五) 国家计划制定方法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的要求，走群众路线。要从预期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出发，先由下而上，然后由中央加上国防和对外开放政策（包括外贸、外资还本付息、对外援助等）的需要，再由上而下论证，如此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反复多次，吸收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和经济、科学技术专家参加，通过充分酝酿论证，力求切合需要与可能的实际，并留有余地。

第二，坚决和稳步地改革价格体制。

物价涉及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关键环节。现行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如果不加改革，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都将难以生效，甚至全部落空。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市场信息主要通过价格来传递，市场机制主要通过价格来运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保护和鼓励竞争，而竞争主要是表现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实体仍然是价值，即活劳动量和物化劳动量的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须根据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都要求价格的灵活性。有了灵活的价格才有灵活的生产和经营，才能从一个主要方面赋予企业以活力，才能推动企业认真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在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及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经济调整时期，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发挥得比较



好，物价比较合理，也比较稳定。但是长期以来，因为价格管得过于僵硬，物价难于根据市场情况作及时的调整，由此造成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和供求关系的不正常现象。价格背离价值，造成企业产品生产的发展与市场需要不相适应，反过来又加重计划管理的困难和负担。因为怕市场混乱，就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冻结物价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各类产品的成本是不断变化的，市场供求情况也在不断变化，于是价格背离价值的幅度便越来越大，这就造成各类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平衡。许多价高利大的产品往往超额完成计划，形成产品积压；不少价低利小的产品完不成计划，造成供应紧张甚至经常脱销。由此可知，价格背离价值是当前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标志和产物，并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严重“病灶”。

改革物价体制的总方针应该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下，正确运用价值规律，适应市场供求使价格大体上接近于价值，并有利于保证各类产品供求的平衡。在当前情况下，计划固定价格、幅度浮动价格、自由价格三者并存的局面还可以暂时不变。但作为长远目标，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价格不应该僵化成为完全冻结、固定不变的，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经常加以调整，使之合理地有升有降，使价格大体接近于价值，以较小的幅度围着价值摆动，以求有利于市场供求的平衡，产需的衔接，并对增产节约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明确认识，物价稳定和物价冻结并不是一码事。冻结物价是不合理的，它会使价格更严重地背离价值。而从长期看，只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货币发行量不超过市场流通的需要，我们稳步地采取合理改革物价体系的方针，不仅物价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而且对增产节约，改善人民生活，增





加财政收入都将发生有利的影响。

在价格体制改革中，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做到：

（一）对各类商品一律实行优质优价，劣质低价的政策。在这基础上，鼓励合理的竞争，促进企业提高质量，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二）适当调整日用消费品的价格，逐步地实行工资与物价的合理挂钩，基本上实现它们两者能同步和配套调整。在财政收支逐步好转的情况下，力争工资的提高率能高于物价的上升率。

（三）适当调整某些生产资料（特别是燃料如煤、电以及钢材等）的价格，促进技术改造和改善经营管理节约成本，减少浪费，以及开辟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作。不能寄希望于涨价。

（四）继续稳步地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的倒挂状态，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注意保证不损害城市消费者的利益。

（五）逐步地适当下放价格管理的权限，同时适当调整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

第三，改革国家机关的职能。这是一件属于上层建筑改革范围的大事。这里主要是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工这三件大事。

国家机关应进一步实行真正的精简，主要掌握宏观指导；微观的企业管理权一律下放给各个行业和企业。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主要任务是：

（一）制订全国的、各行业的、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

（二）制订发展经济和提高技术的方针和政策；



- (三) 部署重点项目的建设；
- (四) 掌握和运用税收、信贷、物价、物资供应等经济手段，按照国家计划，发展经济、科技、文教事业；
- (五) 制订并监督执行各项经济法律和规程；
- (六) 收集、研究和传播经济社会统计和信息；
- (七) 组织协调各行业的活动，并推动各类经济组织和活动的横向联系，推动建立和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开放式的经济网络；
- (八) 组织重大科研课题的攻关，大力推广科研成果；
- (九) 组织和推动各部门各地方培训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督促并检查人才的合理使用；
- (十) 认真总结并大力推广有关部门、地方和企业的先进经验。

政企分开后，各企业必须实行党政分工，即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委主要管住和管好党、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的工作，特别要抓紧结合企业业务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党委应负责监督厂长（经理）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党政分工后，党委的责任更加加重了，由此而克服许多地方和企业党不管党，行政瘫痪，无人负责的不健康现象。

与上述几项主要环节的改革同步和配套进行的，还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分配体制的改革、商业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的改革、外贸体制的改革、以及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待深入和完善，城市体制的改革刚在起步，我们要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的指示，加快改革的步伐。应该说，这番改革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并且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改革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它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迫切需要。正如恩格斯所教导：“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所以，只要我们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并且依靠亿万群众，坚决地勇敢地稳步地前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各项改革的任务，开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放开手脚，勇于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同意武汉地区实行计划单列，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今后在经济管理上有省一级管理权。这个决定对武汉市、武汉地区和整个湖北省、华中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改革与四化建设，一定会起到大的推动作用。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想分以下三个问题讲。

第一个问题，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服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战略

党的十二大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四化新局面的三大任务之中（这三大任务就是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首要的任务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因为，只有搞好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我们祖国的统一才会更容易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才会更有力量些。我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到二〇〇〇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设



想，我们在二〇〇〇年以后要继续努力，争取在二〇三〇年到二〇五〇年，我国的经济水平，包括科学技术水平在内，达到先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今后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的一个总的奋斗目标。我们的同志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为了实现上述的战略目标，在战略部署上，在二〇〇〇年以前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前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是实现新的经济振兴。二〇〇〇年以后，实现更高的经济起飞。在前十年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是我们坚定不移地长期执行的基本国策，决不会轻易变动。最近，赵紫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着重指出我们今后要抓好二件大事。一件是体制改革，另一件是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都要牢牢地抓紧。只有把这两件大事抓好了，我们的宏伟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现在，我们全党全国正面临着三个现实的严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全世界范围的新的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革新，的确日新月异。以微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由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宇航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等所组成的新技术革命，现在已经开了头，并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情况，极大地推动着每个国家和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必然会推动世界各个国家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一次极其伟大的新技术革命，它将使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劳动的内容、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国家在迎接这样严重的挑战中间，究竟应当怎么办？现在国务院在紫阳同志的号召下，成立了一个迎接这个挑战的技术方面的小组，由马洪同志主持，召集各方面专



家，听取群众的意见，来进行研究。我相信在全国范围内，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的。

第二个大挑战，就是世界经济中心很有可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上半期，从欧洲大西洋地区移到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至少亚太地区会形成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中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西欧是最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地区，主要是一些老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经济上也有起飞，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比较美国、日本要差些。现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恢复和增长的过程中是最快的，超过美国和西欧。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预料。许多外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人士讲，中国的经济在前一段世界经济危机中是一个“繁荣的孤岛”，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的的确是发展得比较快的。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间，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这确实不多见。另外，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的、亚洲的、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时期，发展最快的，是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东盟六个国家，以及所谓“四个小老虎”，包括新加坡、香港、我国的台湾省和南朝鲜。这就是说，在整个第三世界里面，发展最快的又在我们亚洲。再加上两个超级大国同亚洲太平洋都有份。美国近二、三十年来新兴工业的发展，现代尖端科技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西部和南部靠太平洋地区。苏联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重点，放在乌拉尔以东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由此可知，在全世界范



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快的地区都在太平洋、亚洲地区。而这种势头将持续下去。所以，各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上半期，世界经济的中心，就象过去曾经从地中海转移到欧洲大西洋一样，将会从欧洲大西洋地区移到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这个趋势对于我们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假设世界经济中心移到东方来，移到亚太地区来，那么我们中国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我们中国人民将赋予一个重大的责任，要求我们对人类进步事业，对世界经济的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六十多年来，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各具特点，各有各的模式。举比较显著的例子来说，一个就是苏联模式，这是最早的模式，也是影响最大的模式。这主要是指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创建的，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改变的模式。它的特点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指令性计划比重特大，轻视市场机制。产业次序是重轻农，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人民生活改善比较慢。第二个是南斯拉夫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同苏联模式相反，它是高度分散，企业自主权和工人自治权大，强调市场经济，重轻农并举，人民生活改善比较快。最近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困难比较多一些。他们现在正努力克服。第三个模式是匈牙利模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取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它强调集中同民主，集权同分权比较正确的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比较正确的结合。所以近一、二十年来，匈牙利经济发展比较好，生产也增长很快，人民生活也改善很快。这样一个



小国在国外严重影响之下，能搞出这样一套是很不容易的。匈牙利是个小国家，它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外国。一面依靠苏联，一面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它的物价也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这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把它搞得很困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改进。

现在，讲到我们中国。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包括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改造，都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同志们都很清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也很想创立我们中国的模式，他对于苏联的模式也有批评，从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大家就可以看到。但是，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直到最近我们的经济模式基本上还是苏联式，没有改动。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好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很成功。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各方面都发展了，这个模式中的许多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毛主席也指出来了，他说我们要农轻重，不要重轻农，要两条腿走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重视价值规律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有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明确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农村里已经初步搞起来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普遍推行，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有人讲，现在又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的改革逼着城市改革。中国模式不久还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九九七年我国在香港要恢复行使主权，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这两个地方都是经济很发达的地区。我们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台湾回归祖国以后，社会经济制度也长期不变。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说整个大陆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两个地方虽小，但是经





济很发达，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在一个国家里面，让两种制度同时并存，这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到底怎么搞法呢？现在我们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着准备迎接这个挑战。大批的外国资本引进来了，大批侨资引进来了，大批的先进技术引进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也引进来了，怎样利用和消化它？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式的新模式，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在探索和创建这样一个模式中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

我们总的战略要求，是要迎接这样的三大挑战，达到上述宏伟目标。我们武汉地区的发展战略，一定要适应这种情况，服从这样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关于武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目标和战略部署的初步意见

根据全国总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我们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来设想一下武汉地区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这里首先要充分认识武汉地区的特点和优势。众所周知，武汉地处全国中心，水陆空运四通八达。同时，它又是我国内地最大的贸易中心，是内外贸易的枢纽和通道。周围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所谓两湖熟，天下足嘛！工业基础也相当雄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钢铁、机械、纺织为主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武汉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总值和税利在全国大城市中都占第四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武汉智力基础比较雄厚，有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几十个科研机关，科技人员十四万人，占全国第三位，它有巨大的智力开发潜力。从这样一个实际出发，依靠党的正确政策，依靠先进科学技术，来全面发展上述各种优



势，同时克服某些劣势（如能源现在较缺，企业经济效益较低，技术还较落后等），把武汉地区建设成为一个东西结合，南北交流，对外开放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具有丰富物资和高度信息，高效益和多功能的我国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即科技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和旅游中心。为了要建设这样一个我国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我认为必须采取下述战略性步骤。其中主要的有：

（1）我们的生产和全部经济生活要以先进的、适用的科学技术作为指导和核心，特别要花大力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一切现有的企业。

（2）在所有制问题上，要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举。这里面有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同时还将包括同外资合营的，以及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

（3）我们一部分中央各部管的企业和省属企业，要下放给市里。中央确定，省政府一般不管企业，中央各部基本上不管企业，只管政策、计划，督促检查和协调。市政府主要也是抓政策、方针和协调。要实行政企分开，党政分工，扩大企业自主权。

（4）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搞活经济，管理经济。一定要“松绑放权”。企业的人权、财权、物权、产权、供应权、销售权，一般都应放给企业。产、供、销在保证国家计划之外，一般采用市场来市场去，通过市场来办。要逐步改革物价体制，首先要真正实行优质优价。实行利改税第二步后，全部征税收，不交利润，税收之外多下来的要提成包干。这样，经济杠杆的作用就大了。工业、商业的改革要同步进行。商品方面，除少



数计划规定的主要品种外，允许自由购销，允许和鼓励跨地区流通，不受现在行政区域的限制。对国内来讲，也有个开放的问题。胡耀邦同志强调，各个省市，各个地区，都要对外开放，决不能自我封锁，划地为牢，本地区的劣质产品应让它消灭，不要保护落后，损害群众。要从外面买好的东西到本地区来，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大局面。将来全国各地的优质产品可以运到武汉来，武汉的优质产品也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去。这样，使全国各地的劣品，差次商品没销路，没出路，当然就要想办法，找出路，能挽救的就挽救，否则就关、停、并、转。我们的商品流通一定要实行改革，克服不问需要和供需脱节的现象，一定要打破地区封锁，实行跨地区流通。现在讲流通，往往是流而不通，甚至不流不通，那还行！要把一大批国营商店退到集体、个体方面去。现在我们的国营商业官商作风严重，人民生活非常不便。你下班，他关门，你上班他开门。你去，他爱理不理。你要找他买什么东西，他在那边抽烟，她在那边打毛线。这种官商作风真是要不得，这是丢社会主义的脸。照这样子，我们的工业产品就没办法卖出去，我们的人民生活也没办法提高。国营商店一部分退到集体，由集体、个人承包或租赁去办。这是一种进步，不是倒退。因为它有利于发展生产，方便人民生活。

（5）武汉地区科技、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旅游业等等要同时并举。目前首先要抓住交通、流通两个环节。有的同志讲“两通起飞”，这是有道理的。武汉地区的这两个特点和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一定时期，突出地抓一下这两个环节，是十分需要的。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武汉长江和内河航运必须由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同时并举来开拓，物资流通渠道必须大力疏通和开辟。这两者抓好



了，就为武汉经济全面振兴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当然就武汉地区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还是适用的，特别是智力开发（科学和教育）是骨干和核心，必须牢牢抓紧。

（6）实行内联和对外开放。我们要同内地密切联系起来。武汉是全国内地的中心，包括西北、西南、整个华中地区。同时我们要挤到国外去，挤到国际市场去，大力实行对外开放。要引进外资，侨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7）要逐步改革我们的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企业领导方面，国家只任命主要领导人，其他的由企业自己去配备，由厂长提名决定。要实行厂长选举制，由职工民主选举，上级任命。劳动就业要普遍实行合同制，改变固定制和终身制。职工和企业签订合同后，工作好就继续聘用，优秀的要升级，表现不好的要降级，减少工资，以至辞退或开除，坚决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制度。

（8）建筑业一定要彻底改革。应参考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普遍实行招标制和承包制，这样工期可以大大缩短，质量可以大大提高，经费可以大大节省。武汉建筑队伍是很有名的，我们要大力把这个地方的建筑行业搞好。

（9）银行实行差别利率制。对于资金周转比较快的、产品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企业，贷款时利率可以低些。对那些产品差的、经济效益低的、资金周转慢的企业，利率就高些。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也就是用信贷这一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发展。

总之，我们要把武汉建成我国内地一个最有力的经济中心，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采取这样一些战略措施。当然这



些措施都要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定出具体办法来，有步骤地实行，决不要一阵风、一刀切。

根据全国发展战略总的目标，我们力争在二〇〇〇年把武汉建成有强大经济活力的大中心城市，并建成以它为中心、以周围中小城市为网点、东靠西移、南北交流的广大富饶的武汉经济区。预计武汉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可以力争比全国的目标高一点。因为这里条件特别好，可否考虑到二〇〇〇年武汉地区工农业总产值能翻两番半。到二〇〇〇年翻两番是就全国范围工农业年总产值说的。全国各地资源和其它条件各异，经济实力很不平衡，所以到二〇〇〇年，有的地方可以翻三番、四番，有的地方只能翻一番半，甚至只能翻一番。条件好的地方可多翻一点，条件差的地方只能少翻一点，不能过份要求，不合实际地要求。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一刀切。各个行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有的可以多翻一点（如电子工业），有的翻不到两番（如煤炭），不能一律要求翻两番。我认为，武汉地区只要抓住智力开发不放，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工农业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完全有可能比其它许多地区快一点、大一点。至于各个县、区，各个部门的产值，应当分别规定，不能一刀切。一面鼓足干劲，科学办事；一面留有余地，准备后劲。这样就比较好。到二〇〇〇年争取翻两番半，这就是我们武汉的战略目标。

现在再来讲战略部署。可否这样设想：第一步，把武汉市建设成有强大经济活力的中心城市，成为一个有强大工业作基础的，全国内地最大的交通运输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第二步要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辐射地区，主要包括湖北省、江汉平原的工农商业发达富饶的武汉经济区。第三步，建立华中经济区，即以武汉为中心，南边到长



沙洞庭湖，东边到南昌、九江鄱阳湖，北边到许昌、郑州，西边到宜昌，再西北到襄樊以至陕西汉中，这样一个广大的综合和多功能的华中经济区。这种经济区的建立，要顺着经济的自然流向，充分发挥武汉这个大中心城市和其它中小城市的作用，摆脱行政区域的人为限制，通过经济渠道，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农商联合体，科研生产联合体和各种贸易中心，金融信贷业务要为它作有效的服务。建立这种经济区，决不能用行政手段，而完全应该运用经济杠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各种经济实体对行政区域实行利益均沾，既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负担承包制；又保证税收后收入统归企业全权支配。各种经济实体应同政府订立合同，并依法坚决履行合同，多交受奖，少交受罚。既受法律保护，又受法律制裁。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思想余毒，摆脱习惯势力，为开创新局面鸣锣开道

为要完成上述战略目标，建立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武汉科学经济中心和经济区，我们必须抓住一个关键：冲破“左”的和形形色色的思想障碍，使我们真正能够放开手脚，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下面我分十个问题来讲。

第一，改革是一场相当长期的十分广泛深刻的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仍然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现在我们搞了三十五年，生产力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却遇到了多种多样的阻力。首先是现在的生产关系里面确有一些东西同生产力继续发展有矛盾，起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譬如所有制问题，我们在大跃进的时候，拼命地强调“一大二公”，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实行所谓穷过渡。这种生产关系同现有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吗？经过多年



的实践，证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的地方（如安徽）已经提出实行包产到户这个制度，而后来受到批评给压下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安徽和四川首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发挥，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由此可知，“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原来人民公社那种政企合一的组织形式，并不适合我们当前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流通方面讲，强调产品调配的自然经济，不注意发展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大大束缚了专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从分配问题来讲，现在还实行那套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以及不问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可以终身吃国家和集体的大锅饭，这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生产力的发展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奖懒罚勤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生产关系的重要部分）是十分不利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制度只会使生产力停滞和萎缩，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现行的生产关系的某些部分加以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那么，上层建筑怎么样呢？我们的政府机构重重迭迭，官僚主义严重，浪费严重。我们的政策在三中全会以前，有许多不对头，特别是指导思想有严重的“左”的错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还很不够，我们还有严重的“左”的思想残余，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范围内不适应于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地方，我们都要加以改革和调整。所以我们说这一次体制改革是一场十分广泛深刻的革命。革什么命呢？就是要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状况，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命，要革那些不适应于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命。这就是体制改革的全部涵义。它涉及到某些政策、法律、规定、机构、制度、思想和作风，涉及面很广，触及的部位很深，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所以说改革是一场十分广泛深刻的革命，决不是短期间所能完全解决，而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不断的努力才能解决的任务。当然，这场革命绝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人民内部用行政、法制和说服教育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没有哪一个是纯而又纯的单晶体。比如，奴隶社会里就有许多氏族制、村社制的残余，同时它已经有个体商品经济。封建社会又怎么样呢？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汉朝，还有许多奴隶存在，同时商品经济也在发展，后来逐步开辟了丝绸之路直通西亚、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又怎么样？同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譬如德国、日本封建制度的东西相当多，又存在着小农生产。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遗产，它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南部到现在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过去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是由一种经济制度（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分别占统治地位、同时利用其它经济成分为“己”所用。根据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还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形态，一般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个体所有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且它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农村百分之八十多是个体农户；波兰也存在着大量个体农民。同时，在绝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两种东西：一个叫全民所有制，一个叫集体所有制。这是列宁首创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还没有发展到生产出无比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料，可供人人各取所需。产品不够丰富，因此还只能按劳分配。另外一个人民的觉悟还不够高，还有人想偷懒，占便宜，所以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适应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唯一正确的分配原则。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是主体，它同集体所有制将长期并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亲生儿子，是应当平起平坐的亲兄弟；绝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亲生儿子，集体所有制是干儿子。列宁说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全民所有制当然是老大，但并不高于集体所有制。它们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推动，互相竞赛。试看现在情况，许多集体所有制企业比全民所有制企业搞得更好，全民所有制那种吃大锅饭的办法，官商派头，集体所有制就比较少。人事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在集体所有制企业比较容易，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尤其在今天，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赶快向办得好的集体企业学习，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可以退到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盲目升级。最近赵紫阳同志讲了，商业部门一大批的商店交给个人办，集体办，变成集体所有制，变成个体所有制，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来了。那种国营商业在现在体制下要搞好，我看不可能。前些



时，我到王府井百货公司买双袜子，那个女服务员说：“你这个尺寸这里没货”，一口回绝了。我说：“你替我量一量，好不好？”她说：“量？我哪里有这么长时间！”我说：“你拿两双袜子给我试试，好不好？”她说：“我没这么多时间！”实在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她吃的是企业的也是国家的大锅饭，端着铁饭碗啊！集体企业可不同了。上海有许多里弄集体所有制工厂办得真好，他们生财有道，门路很多，改革步子快，所以我碰到一些国营企业的领导，总劝他们去参观参观这些里弄集体工厂。我们千万再不要迷信集体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低一级的说法了。是的，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大一点，企业规模大一点，资金多一点，但这些并不规定它比集体所有制是更高一级的公有制。事实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许多因素是互相渗透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从发展中阶段上升到发达阶段，这两种公有制可能溶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全社会公有制，而不是一个吃掉另一个。当然，也有可能在全民所有制充分搞活了，民主管理真正搞好了，小规模集体企业自觉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决不是过去那样的强迫升级。所谓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定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论调，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它们是平起平坐的亲兄弟。南斯拉夫不承认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它实行社会所有制，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参考价值。我们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处理，而决不要照搬别人那一套。过去我们在政策上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所忽视，甚至有所歧视，这是错误的，今后应当改过来，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原料供应、供销条件、生产工具的供应都要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真正做到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互相竞赛，共同发



展。至于对个体经济，必须明确肯定它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将长期存在，再不要把它当资本主义尾巴去割了。这个补充对于社会主义只有好处，对于发展生产力只有好处。特别是饮食服务行业、维修、缝补、运输、摊贩业等等，我们要放手让集体、个体去办，这样既方便人民生活，又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当然，我们对个体企业也要加强管理，给以指导。此外，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一些外资，同我们合资经营或独资经营，搞一些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补充，这也是十分需要的，而且是长期需要。

### 第三，所有制和经营方式问题。

经营管理制度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几年来，我们首先在农村，现在在城市，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收效很大。工农企业经营方式的这种改革，对于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发展生产，非常有利。前两年我到深圳去的时候，他们讲了四个字：“一包就灵”。各项经济建设都采取承包责任制，责、权、利结合，进展很快，质量和效率都高。我觉得很有道理。承包制既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的状况，又适应当前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来有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点怀疑。现在全世界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好，在发展中国家也好，凡是国有经济的经营一般都比私人经济差。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营企业比个体经济效益差，是经营方法不对头，绝不是国营企业本质上不如个体企业。这里有个经营管理方法同所有制的矛盾问题。只有把经营管理制度改善了，就会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我们搞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只是经营方式



方法的改变，根本不是所有制的改变。现在我们农村里还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不准买卖。我们在城市里边搞承包，全民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所有制根本没变，但我们一用承包制，生产就上升，经济效益就提高，职工生活就改善。这种经营管理方法的改变，巩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更好地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有人认为，搞承包，包产到户，包产到人，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只能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还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靠雇佣劳动制剥削剩余价值为生的社会。承包怎么是剥削人家呢？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或集体，由职工和农民来承包，来经营，来生产，达到不断提高生产，增加税利，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对国家、对企业、对个人三者都有利，怎么会搞出一个资本主义来呢？这些害怕和顾虑，都是多余的，是习惯于“左”的错误思想的表现。

#### 第四，关于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楚。大锅饭、铁饭碗究竟是什么？它究竟违反了什么？首先它从基本上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什么叫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在职工人各尽所能，敲骨吮髓，“剥两层皮”（列宁语）；但分配呢，它是按资分配，即按投入资本的多少分配，分配他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到高度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就照给，就叫做各取所需。但这是要在物质和精神产品无比丰富，人民觉悟空前提高（比如，认为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之后，才有可能实行这样的原则。到那时，各尽所能是自愿的，各取所需也是自觉的。大锅饭和铁饭



碗是一种平均主义政策，其阶级根源是农民小生产者。这种平均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如土地革命）有它的革命性。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拼命和敌人打仗。我们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命也不管，只要吃点饭，有劲去打仗，战胜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你只要参加革命队伍，参加革命工作，就得给饭吃，而且只能吃得差不多。津贴费三块、五块也差不多。这个时期只能实行这个办法，大锅饭的办法，平均主义的办法。但一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吃大锅饭、铁饭碗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那一套就逐渐显示出它的反动性来了。大锅饭、铁饭碗这种分配制度的反动性，就表现在它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它在这个新历史时期的作用只是鼓励懒汉，打击先进，奖懒罚勤，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都能活下去。但这不是铁饭碗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优越性，就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福利制度。我们对于老弱病残，对伤员、对五保户一定要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但这同铁饭碗根本不同。铁饭碗是能劳动而不劳动还给他饭吃，这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饿死活该，你能劳动为什么不劳动呢？你能劳动而不劳动，坐享其成，那就是剥削别人的劳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容许剥削和剥削者存在的。

#### 第五，条块分割，重重捆绑的体制问题。

现在我们的体制是条块分割，重重捆绑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对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五花大绑，五马分尸，是杀鸡取卵。这就是现在体制的弊病：它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要发展，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调动起来。最近万里同志讲，我们的城市体制要改革，这就是把城市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起来。现在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割据，



各部门各行业的封闭，这种局面的实质是封建割据和行会封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残余表现。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苏联要大量地发展军火工业，重视重工业，权力过于集中。这种体制确实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我们要改，而且必须彻底改。苏联的体制带有一定的封建性，而我们中国的封建传统更浓厚些。在这条条块块分割的体制里，块块里是书记说了算，条条里是部长、局长说了算，这里还加上一个家长制。家长制加上封建割据行会封锁，危害就更厉害了。生产资料、消耗资料以至干部、人才都是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呢？集体所有制呢？在这里实际上往往烟消云散了。这实质上是封建行会占有制。这里面有一个权同钱的问题。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一切”，这是林彪的“名言”。我们有些同志热衷于维护那种带有封建割据行会封锁性质的地区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客观上就是中了这个毒。有权，口袋里就可以拿进东西，拿出东西，人们称之为口袋政策。这类腐朽东西，是现行不合理的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所以这种体制必须彻底改，非改不可；不改，一切不能前进，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改革体制首先要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中央各部门和省、市政府、各厅局，要按照国务院规定，一定把企业下放，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举凡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十项权力，一律要下放给企业。必须明确认识，企业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细胞活了，整个机体才能活；企业活了，整个经济才能活起来。所以，我们对内搞活经济的关键就在于简政放权，让企业成为真正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有些党委书记、工会主席不赞成厂长责任制，发牢骚说，“厂长当了家，党委书记当杂差，工会主席做了伢(孩子)”。邓小平同志



说，我愿意负责科学文化事业，当后勤。邓小平同志都愿意当后勤，而我们的党委书记就不愿意，就要书记至上，搞一言堂，这实际上是歪曲了党的领导一元化。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有什么不好呢？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都有自己的职责。党章、宪法、工会章程都有明确规定。党委集中力量管好党，管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任务重得很啊！政企分开，行政部门的大事就是掌握方针政策，抓好计划，督促检查，组织协调，提供信息和技术，专管宏观经济，把微观经济的一切都下放给企业，这才是抱了西瓜，丢下芝麻，这又有多好呢！

#### 第六，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

这是赵紫阳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的。我们一定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垄断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它的垄断权就是垄断最大利润。对于这，我们当然是坚决反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毛主席都主张，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譬如对外贸易，要有垄断。外贸不垄断，就不能同外国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的银行、铁路、粮食收购也要垄断。除这些之外，就要按价值规律办事，鼓励竞争。我们许多产品十年、二十年一贯制，就是因为没有竞争。我们在日本丰田厂看到，它的产品年年变，半年就变，一年半就有新产品出来。我们的上海牌、红旗牌汽车几十年一贯制，出了毛病也不管，什么原因？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再如民航，国内外乘客对发生事故、飞行不准时和服务态度意见很大，但能照常办事，反正亏本由国家贴，与它无关。现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都在准备成立民航公司，搞竞争，这是好事，我们赞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一般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中，在人民内部要实行竞争。



竞争能促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进管理方法，促进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一句话，能鼓励先进，增进效益。社会主义竞争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主义竞赛，要大力提倡。垄断在人民内部最容易鼓励后进、保护落后，使社会生产力不能发展，整个社会不能前进。

第七，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在劳动致富的基础上，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先富起来。

这是不是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呢？不是。这是加速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促进全国富裕的重要战略决策。我们有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有国家法律的保障，决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更说不上什么导致资本主义。我们党的政策是提倡和鼓励在勤劳致富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样来带动全国人民和全国各个地区的共同富裕。譬如武汉，应当努力发展经济，先富起来，然后可以输送人才，输送技术，扩大航运能力等等，帮助西南，西北地区都富起来。现在许多富裕户在家里自费办一个学习班，让许多人去学习。我到广东看到一个富裕户请了两个教师开了个学校让人们上学。有一个富裕户请医生给附近农民看病，医药费由他出，那多好啊！难道这叫贫富悬殊？我在佛山看到一个万元户去年收入一万二千五百块钱，他是靠种花富起来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生产队办了一个种花农场。他要使自己的富带动大家富，便义务当这个农场的经理，不要一分钱，办得非常有成绩。这就是共同富裕。这怎么叫贫富悬殊、搞资本主义呢？加上我们党还在加强思想教育。现在许多万元户中的一些同志加入了党组织。所以，上述那种顾虑完全不必要。在改革中提倡专业户先富起来，有些地区先富起来是完全正确的，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当然，我们党和国家决不容许更





不提倡靠剥削、搞投机倒把、搞地区封锁致富，因为这些都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第八，知识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邓小平、赵紫阳同志讲了，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你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怎样迎接它呢？前些时，彭真同志接见北京市人民代表时讲：我们搞了三十多年，还有这么多文盲，我们党和政府是有责任的。智力开发和智力投资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应该大大改进。这里有个认识问题。我们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或者还不承认知识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讲过，科学是生产力。恩格斯也讲科学是革命的强大力量，有的时候科学比人的革命力量还大。所以不掌握科学不行，特别是现在搞四化建设。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很多人还不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我党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一大批就是知识分子。毛主席、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了，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它的先锋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贡献了多大的力量！五十年代由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培养出的大批知识分子是当前四化建设的骨干。到了以后，知识分子更是工人阶级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工人阶级将越来越知识化。以后到了所谓信息社会，什么都是通过知识、通过信息，来办经济。我们到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美国去参观工厂的时候，在大车间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它就靠自动化机器、机器人操作，只看到二、三个人掌握着仪表。有一次，我在日本丰田厂参观问一个人“你是工人吗？”他说：“我是大学生。”在这些人中，有的还是硕士。工人阶级



要知识化，工农知识分子将越来越多。所以，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那种看不起知识分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有个别同志看到我们党重视知识分子，就说知识分子翘尾巴了。我到上海，听到有人说：“八路打天下，九路坐天下”。这种牢骚是不好的，这是工农同志缺乏知识，缺乏文化的一种表现，不了解四化首先靠科学技术现代化领头，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没有知识分子，四化根本化不起来。北京机关里有好几十台电子计算机，有好多至今没有使用，坏掉了。为什么？没有人会用。非常精密的仪器，现代化的机器一定要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来掌握，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知识，很好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近邓颖超同志在政协大会上强调：能不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能不能很好地解决，是能否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标志之一。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务必要抓紧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是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为了有效地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要认真地改革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方面的管理体制。

第九，只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长处，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一个无产阶级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假使不去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点和长处，是决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话。当前的世界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同时并存、互相依存、互相斗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两者同时并存，互相依赖。比如说吧，美国在投资和市场方面要靠我们，我们也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靠点美国。我们承认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关系，然后，认真



地取资本主义之长，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取人所长，补己之短。我们现在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管理方法不科学，我们就要积极引进外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壮大我们的力量。正如列宁讲的，运用外国资本总要纳点贡税，让它赚点钱去。但是，我们得到的好处，是我们工业生产大发展，科学技术大进步，人民生活大改善。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有马列主义理论根据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坚定不移的。外国人总怕我们变。我们说，正确的政策，变了对我们不利，我们为什么要变呢？国内则有人不赞成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不赞成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说这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最后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种论点是“左”的残余，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实事求是地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也可以说是形左实右，实际上是封建行会、小生产的那种自然经济、闭关锁国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批判。我们在武汉一定要积极地引进外国资本，引进先进技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和将来长江实行开放的挑战。

#### 第十，摆脱习惯势力。

当前改革的阻力一是“左”的思想残余作祟，二是习惯势力作怪。习惯势力是什么？它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几十年来搞习惯了的东西，例如，条块分割、单纯用行政方法管经济，书记一言堂等等，一时改不了，也不愿改。从思想意识上讲，它保护个人或小组的既得利益，是林彪讲的“有权就有一切”那种腐朽、没落思想的一种合法表现。它在现行体制上讲是合法的，现行体制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不愿意放，不愿意松绑。这种思想和行为实质上很



腐朽很落后。所以一定要冲破和摆脱这种习惯势力。我们特别要警惕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或对习惯势力有特殊癖好，靠行“左”起家的人。他们在维护习惯势力中常常是顽固的积极分子。对这种人我们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决严肃地予以处理。当然还有一些老同志，甚至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也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习惯势力，有形无形中抵制改革。对于他们，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别情况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转到改革的队伍里来。

以上讲的十条，从思想理论上提出了一些问题，请大家研究，开展讨论。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冲破这些障碍，那改革就无法前进一步，它们对改革是五花大绑，必须冲破、必须摆脱，然后才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实现我们宏伟的战略目标。因此，进行这个改革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胆识和毅力，才能开拓前进，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关于对外开放战略 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中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两件大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对外开放。搞好对外开放，首先要明确有关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决策，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开放型的国家。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开放型的。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全世界各国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它打开了世界并征服了世界。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资产者走遍世界，到处开拓，到处经营。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的无产阶级更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所从事的解放事业，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应当而且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一切先进的成就，以此为基础，去建设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真正自由平等，光明灿烂的新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具有最远大的眼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所领导的国家应当是更加开放型的国家，以便于最终使国家消亡。



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形成我们对外开放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按照原定的写作计划,马克思曾打算在《资本论》第四卷和第五卷论述世界市场、对外贸易、外汇等问题。但他没能来得及对这些问题做详尽的阐述。但他在《资本论》中的一些有关论述,例如,关于世界市场、商品的国际价值、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理论,以及关于资本输出等等,至今仍然有效。《共产党宣言》描述过,资产阶级造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世界性联系,使它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列宁在领导苏联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提倡租让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矿山租给外国资本家,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他强调,不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接受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成就,不肯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长处,那他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论述,认为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孤立存在。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在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量引进了外资和先进技术,并且聘用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帮助苏联搞建设。二十、三十年代的许多重点项目,几乎都是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并聘用了美国和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搞起来的。一些帮助苏联建设的外国专家还获得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也强调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指出必须打开两个市场,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必



须利用两种资源，即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必须学会两套本领，即搞好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本领，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战略措施，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具体国情出发，特别从生产力的状况出发，采取多种经济形式。不仅要有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要有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按照对外开放的方针，引进外资，创办合资企业或外国资本的独营企业，这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十分有益的补充。因此，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二、对外开放是全面开放，是面向全世界，而不是面对世界的某一局部的开放。

第一，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贸易。

处理我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要从世界形势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并存、互相依赖、互相斗争，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第一次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很好，使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做出这样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社会主义很快就要胜利。然而，事实却是两类国家的长期并存。列宁估计帝国主义尽管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还会有高度的发展。二次大战后斯大林却认为这种估计过时了。但是，事实证明了列宁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局部地调整了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还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另一方



面，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掌握不够，也常常出现失误，走弯路。从国际上看是这样，从中国的情况看也是这样。这是事实。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会并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长期并存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我们需要利用外国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外国资本则看中和需要中国这个广大的潜在市场。这两类国家的相互斗争始终存在。我们的斗争目的在于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他们却妄图使我们资本主义化，使资本主义永存。斗争的最终结果，按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一定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实行大胆的开放政策。有人认为，开放会复辟资本主义，办经济特区是殖民地化，开放沿海城市是蹈旧中国“门户开放”的覆辙，劳务输出是送上门去受人家剥削。这种种观点都是受“左”的思想的束缚，都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常常失去自信，害怕资本主义，却不了解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着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苏联建国初期，条件那么困难，国际环境那么恶劣，列宁和斯大林还敢于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在今天这样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应当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

第二，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友好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按照各自的国情，采取合乎本国实际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互不干涉，互不强加于人，实行真正平等友好的经济合作。近年来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增加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这是完全正





确的。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曾提出，有两个并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战后，世界分裂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就是依据这种形势提出来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建设，起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是，六十年代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与社会主义国家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现在，世界市场依然是统一的世界市场，并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统一的世界市场也愈加发展。斯大林的上述理论显然已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

第三，更要向第三世界开放。

积极团结和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要支持他们为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实质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继续。我们要积极参加南南合作。帮助它们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以巩固其政治上的独立。要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其中包括对那些比较穷困的国家给予国际主义的援助。

我们对外开放要做到全面开放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如上所说，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一律实行开放政策，但对各类国家又要有所区别。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完全平等友好的合作。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方针



下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和互助合作。对同一类国家中的不同国家，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总之，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实行多元化的战略方针。

### 三、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对内搞活经济的关系。

自力更生决不能理解为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是指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建设。闭关锁国是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表现，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对外开放，目的在于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比如，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们的生产更加现代化，这就增强了自力更生的力量。而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对外开放的领域就越广阔。我们工业力量的增强，促成越来越多的商品出口，换来越来越多的外汇，从而又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商品进口。因此，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关系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要自觉地依赖和运用价值规律，用经济杠杆来实现。这是我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不应该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商品经济，它为奴隶主服务；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商品经济，它为封建主服务。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最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它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存，以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存在着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这个新的突破对于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有重



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够摆脱从苏联搬来的那种把计划经济作为唯一主体，排除市场机制，靠行政手段办经济的僵化模式，把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搞活，整个国民经济搞活。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方法，改造老企业，兴办新企业，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将增强国家财力，增强利用外资的能力，从而更加促进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向前进展。

#### 四、对外开放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相结合。

一般讲，发展中国家有两种经济发展战略，一种是进口替代战略，另一种是出口替代战略。这两种战略方针在许多情况不同的国家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都有一定的缺点。进口替代战略着重发展民族经济，限制国外先进工业制造品的进口，但它常常保护了国内产品的落后。出口替代战略着重搞加工出口工业，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单一化，加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丧失经济的独立自主。我国的国内市场庞大，资源丰富，进口、出口都有一定基础，所以应把两种战略方针兼收并用，不是单纯搞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既要发展民族经济，又要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采取出口进口互相促进的方针，不要为出口而出口，为进口而进口，出口多进口多都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宏观效益，促进现代化。比如，进口粮食可以使有些地区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工业。我们对进出口贸易的理解要从国家的宏观利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要求来考虑，不能单纯看微观效益。进出口的微观效益主要靠改革外经外贸的体制、改善经营管理，使外贸扭亏为盈。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必须靠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经济效益才能大。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统一起来，微



观效益要服从于宏观效益，而宏观效益又必须以微观效益为基础。

还有两种理论也需要研究。一种是作为出口替代的指导理论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或叫比较利益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发展之时，比较成本说在反对封建割据，处理谷物税，开拓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学说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的。按照这个理论，贸易双方都得到好处，两个国家都节约了劳动。这是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合理核心，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核心，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在对外贸易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利用这个理论。出口替代论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尽量多出口，可以互相节约劳动，首先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理论有一个基本性错误，它掩盖了发达国家对比较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不能把这个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我们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外贸易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另外一种理论叫“常数”论，即一个国家的进出口额要和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一定的比例，这是个常数，不是变数。这个理论在七十年代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大进步，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额会越来越来大，常数成为可以逐步增加的变数了。现在，我国的进出口额还少得很，还应大力发展，所以常数论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不应受它的限制。

##### 五、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物



质生产是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也必然是世界性的，都不能为一个国家所垄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吸收世界上全部文明的积极成果，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也包括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比如科学、技术、艺术、哲学、卫生习惯，道德规范、文明礼貌等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标志是劳动生产率要高于资本主义，但现在我们还远远不够，所以要引进它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我们的生产。现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宇航工程等基础科学，资本主义国家都比我们先进，就应当学习，决不能搞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那种愚昧落后的张铁生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有它的致命弱点，它必然要灭亡。但是它比封建主义好，它没有封建社会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资本主义企业的办事效率比我们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要高得多。在对外开放中学习他们的高效率，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内容。当然，在吸收他们长处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它们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抵制和反对各种精神污染。我们要坚决实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总的来说，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矛盾，只要我们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它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观点，供我们参考。比如，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苏联东欧国家从五十年代起就展开了讨论，材料很多。我们就应当深入研究，这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

#### 六、对外政策与对外开放

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说是经济外交。因此，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同各个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对我们的外交工



作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办经济特区，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窗口。我们的经济外交活动除了政府间的贸易经济活动之外，还要有民间往来。民间外交要同政府外交相结合，就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力量。“一国两制”是我们对外开放中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构想，香港和台湾回归祖国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将有更多更大的窗口，将会极大地开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最后，讲一点天津对外开放问题。天津背靠首都，是沿海第二大城市，是带动华北经济的枢纽。天津不仅仅是天津的天津，而且是华北的天津，全中国的天津。因此，研究天津的发展战略，一定要面向华北、面向全国、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太平洋和亚洲地区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天津作为沿海大港口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将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可以说中外闻名。我相信天津市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在执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中大胆创新，为全国提供更多的好经验，为开创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天津市  
对外开放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 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英明构想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三十五周年前夕，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全国人民，包括五百多万香港同胞在内，欢欣鼓舞，世界舆论包括英国朝野人士在内同声赞誉，认为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香港问题为和平解决当今世界各项历史争端问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和平解决香港问题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设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这个设想的内涵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内，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我国主权的香港和今后在回归祖国的台湾，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容许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互相支援，共同繁荣。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这个精神，我党决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



明建设一起抓等一系列基本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恢复和形成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随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与台湾的和平回归祖国，我们这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会带有一个新的重大特点，那就是中英两国政府所确认的，并受到世界舆论所赞赏的“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它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大创举。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我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摆脱“左”倾错误，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产物。早在一九七八年底，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制定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决策时就形成了这个设想。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大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台湾在祖国统一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

关于香港问题，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邓小平同志就曾同她谈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案和平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主张。接着制订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时更是把这体设想具化了。以后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和





七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同志两次接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都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问题。赵紫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五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说明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政策。他说：“我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五十年内不予改变。这些政策包括：根据我们宪法第三十一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充分地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深思熟虑，为了和平统一祖国而提出来的重大决策。

就香港来说，众所周知，香港几千年来一直是我国领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后，英国凭借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占的。而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就从来没有承认过。因此，中国到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是天经地义的，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一百多年来，港英当局依靠和利用了各种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的聪敏才智、刻苦勤奋，祖国大陆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定时期的国际有利形势，在香港进行了经济开发。特别近二十年来，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七十年代其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两倍于西德，四倍于美国。香港对外贸易额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占第二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第十六位。香港工业产品质量较高，现在成衣、手表、玩具、收音机、电风扇等十种产品的出口额占



世界第一位。一九八三年人均生产总值达三万八千九百港元，人均收入达四千六百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居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整个经济形势比较稳定和繁荣。主要缺点，它是处于殖民地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精神生活空虚，社会治安不宁。

党中央和国务院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对上述香港的历史事实和现状，作了充分考虑。同时鉴于当前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历史阶段；国内全力实行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利用外资、侨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催化剂。正是从世界和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首先来解决香港问题，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迈出一大步。实现这个决策，对香港人民非常有利，对中国人民非常有利，对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也都是有利的。

为什么说这一决策对香港人民非常有利呢？首先，是因为它可以实现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渴求和平回归祖国的愿望，使他们摆脱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享有作为强大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主人翁的无上光荣。同时，可以使香港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真诚愿望中国能如期恢复行使主权的，但同时又担心在收回主权以后，说过的话没有保证，从而使人心动荡，资金和人才外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香港居民的这种心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中英联合声明明确决定，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在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权之后，香港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自由港和独立的关税地区地位不变，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不变，香港同各国、各地区和各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和外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由香港当地人组成。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局面必然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更加稳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将继续保持繁荣和更加繁荣。居民生活水平，不仅不会降低，由于经济继续发展，大陆内地的供应更加充分，还将继续提高。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此，上述那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对全中国人民非常有利。首先，这个方针保证了香港问题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实现了和平统一祖国这一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必将有力地推进台湾和平回归祖国。而且只有用这样的方针，才能保持香港稳定与繁荣。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豪氏所说，中英双方应该妥善地解决问题，“以实现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础上确保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其次，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有极大的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的劣势是资金不足，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和繁荣，极大地有利于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大量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并且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我们还可以通过香港聘用外国专家，为我国培训人才，促进我国智力开发，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

此外，亚太地区今后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香港在亚太地区作为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中心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今后，它将作为我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



政区的重要角色，和我国沿海的上海、大连、天津、广州等港口城市相互配合和协作，实行内联外放，一方面大大打开国际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另一方面大大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人认为，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将会使香港的资本主义逐步挤垮我国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但是我们必须有适当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还将建立一定数量的中外合营和外资独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香港尽管经济比较发达，它们长期保持资本主义不变，相对来说，它也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壮大，而决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试想大陆人口是香港人口的二百倍，全国土地面积是香港地区面积的九千多倍，香港的生产总值约为大陆社会总产值的二十五分之一（一九八二年）。

在这种条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再怎么发展，也绝对不可能在全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绝对改变不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对世界有关国家都很有利。它首先对英国有利。第一，它使英国摆脱对香港的那种早已过时的殖民统治，将使英国在全世界赢得美好的政治声誉，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赞赏。两年多来，英国领导人在中英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中所持的明智的和有远见的立场，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其次，中英双方协议保证，在一九九七年后，英国在港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照顾，对英籍公



务人员和警察，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予以留用，待遇不降低。第三，更重要的，有利于以后中英两国将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文化合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正在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友谊。中英经济、贸易交流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这对英国经济的振兴，是很有利的。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香港仍然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仍然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这对美国、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对澳、欧、非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复苏振兴都将是有利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由我国领导人正式提出后，受到了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国外侨胞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台湾学者沈君山和立法委员卜少夫等主张“一个中国、两个制度”的竞赛，就是例子。特别值得指出的，英国朝野人士，包括撒切尔夫人、前首相希思、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以及不少国会议员，也支持这个设想，同意用和平方式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杰弗里·豪并且表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现在香港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更使我们信心倍增，肯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行得通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我党中央、国务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前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新发展。它构成了我们和平统一祖国这一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其一部分内容已经载入我国的宪法第三十一条。它符合香港人民、台湾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决不会轻易变动的。

有人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好虽好，但怕只



是说说而已，并不能见诸实施；或者说只怕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事一变，也就变了。我们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不必要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在现在，在今后，凡是正确的政策决不会变，也谁都变不了。我们的国家是按政策，按宪法、法律办事的。我国的任何政策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由中央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任何个人说了算的。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更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我们坚决维护正确政策、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决不搞什么小动作。

有人认为，我国在收回香港主权以后，让香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就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个想法不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确实有它的优点，但它有致命的弱点：存在着剥削制度，贫富悬殊，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这个致命弱点，同时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长处，来逐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我们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并且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所以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同时，在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大陆与香港、台湾在经济上相互支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行两种制度在一国范围内的和平竞赛。这一竞赛的过程和结果，将对世界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

还有人说，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一党两制”改头换面的说法。这是曲解。我们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关系摆正。不错，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



行，并且取得了胜利和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主要靠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我们的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党。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国家服务。人民是国家的唯一主人，共产党员及其干部是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勤务员。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共同管理国家政务，互相监督，荣辱与共。香港在收回主权以后，实行港人治港，由香港本地各界人民的代表组成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行将制定的基本法管理香港，根本谈不到“一党专政”的问题。所以，“一党两制”的帽子是决然戴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来的。

“一国两制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台湾宣传机器这样说。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它说对的部分，就是在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正确解决香港问题的艰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乎必须广泛深入地展开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要向香港各界代表人物做大量的统战工作，也要向英国朝野人士做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宝。说错了的一半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无论在国内问题或者国际问题上都绝对不允许搞阴谋。相反，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讲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公开说明我们的各项政策，一切都放在桌面上和平地友好地进行会谈和解决各项问题的。

有人评论“一国两制”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可以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经济基础。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后，香港、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上层建筑的最大改变，这种改变必将促使香港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改变，云云。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教条式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因为第一，中英两国政府作出



了中国从一九九七年后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的决定，这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起的最强有力的反作用。第二，香港当地居民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并且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形式把“一个国家、两个制度”的决策固定下来，这样便保证了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长期不变。

最后，有人提问，实行了“一国两制”，经过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最后结果将怎样呢？我们认为，今天谁也不必，也不可能为六、七十年以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预制蓝图。我们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比我们更加聪敏懂事得多，他们必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法则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密切结合当时的实际，作出最明智的抉择。

用“一国两制”和平地解决国内和国际争端，在世界上是一个新的尝试。在当前中英合作、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上，它已初见成效。正因为这个方法既切合实际，又合情合理，只要各方以维护世界和平、振兴各国经济为重，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商谈解决问题的方针，对于缓解和消除当前世界上许多类似的足以引起严重冲突的爆发点，可能是大有裨益的。近来欧美不少学者评论道，“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还“足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参见梁厚甫的《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明报》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看来，这种评论并非全无根据。





## 钱俊瑞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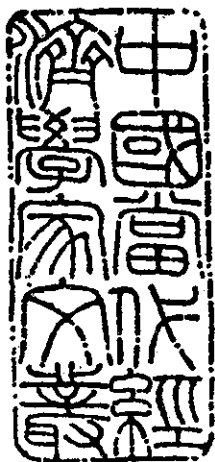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325 字数，575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

书号：4088·88 定价：（平装）5.75 元  
（精装）6.85 元



书号： 4088·88

定价：(平装)5.75 元